

# Translation Quarterly

---

No. 90 2018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翻譯季刊

二〇一八年  
第九十期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翻譯季刊》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第九十期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90, December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18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90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has entered into an electronic licensing relationship with EBSCO Publishing, the world's most prolific aggregator of full text journals, magazines and other sources. The full text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n be found on EBSCO Publishing's databases.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創刊主編 **Founding Chief Editor**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主編 **Chief Editors**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倪若誠 Robert Neather

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s**

陳嘉恩 Shelby Chan 李波 Li Bo

李德超 Li Dechao 劉康龍 Liu Kanglong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嚴康焯 (主席) Foster Yim (Chairman)

潘漢光 Joseph Poon 鄢秀 Yan Xiu Jackie

李忠慶 Lee Tong King 邵璐 Shao Lu

洪蘭星 Stella Sorby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Mona Baker

林文月 Lin Wen-yueh Cay Dollerup

羅新璋 Luo Xinzhang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謝天振 Xie Tianzhen Wolfgang Lörscher

楊承淑 Yang Chengshu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編務經理 **Editorial Manager**

馬偉東 Tony Ma

## 編者的話：

本期收錄了四篇學術論文，分別探討了同性戀文學翻譯、翻譯教學、翻譯起源和字幕翻譯這些議題。

由余靜與周韻妮所撰寫的首篇論文討論了西方同性戀文化和文學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雖然當今中國大陸主流文化對這種現象亦有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就譯界而言，這個問題仍然是相當的敏感。余與周的研究以安妮·普魯（Annie Proulx）的小說《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的多個中譯本為例，考察譯者在處理同性戀文化作品的翻譯策略，以及這些策略如何影響作品中對該文化的重構，並探討譯者翻譯策略背後的文化、社會和政治上的因素。

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如今在中國大陸的各個高校開展的如火如荼。但培養出來的學生與市場的需求是否一致？其課程設置方面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王惠和阮周林的論文認為培養專門領域翻譯碩士將會是其中一條出路，並從培訓機構（學校）、學習者、以及翻譯教師（師資配備）三個方面做需求和環境分析，探討課程設置的影響因素。文章最後還以西交利物浦大學“大眾傳媒翻譯”碩士項目為例，說明如何設置相關課程，以達到專門領域翻譯碩士的培養目標。

對於翻譯的起源一直眾說紛紜。西方深受宗教的影響，《舊約全書》中，上帝打亂居住在巴別塔中人類的使用語言，讓大家互相不明白對方，這普遍認為是翻譯活動的肇始。而在中國，翻譯活動的起源是什麼呢？邵有學從翻譯的廣義定義出發，以史料為依據，提出中國翻譯活動應是起源於上古時期與神靈溝通的巫覡，這是因為巫覡起到溝通人界和神界的作用，把神的旨意傳譯給凡人，進行人天、人鬼、人神之間的溝通，可以認為是最初的翻譯工作者。

本期收錄孫喜晨的英文論文把電影當作一種多模態文本，以影片《山河故人》中的對話翻譯為例，探討了電影方言字幕英譯中產生的均化效應 (levelling effect)。換言之，她發現英譯文中對這些方言的翻譯失去了原來獨特的地域和文化色彩，而變成一種常態化的語言。她繼而提出一種方言字幕翻譯的分析模式，提出兩種不同的處理或補償方式。

最後亦有香港翻譯學會前會長，本雜誌創刊主編劉靖之教授所著回憶錄，詳述了香港翻譯學會在1991至2018的發展歷程，娓娓道來在這段時間裡香港的語文教育和翻譯課程發生的變化，其中還包括本雜誌《翻譯季刊》的創刊始末。過去二十多年來，本刊不為任何一派翻譯理論所左右，不隸屬於任何一間學術機構，獨立自主，致力於為翻譯學術界提供一個公平、開放的平臺。對於這一辦刊方針，我們一定會繼續堅持和努力。

李德超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目錄 CONTENTS

*iv* 編者的話

**論文 Articles**

- 1 從小說《斷背山》中譯本看同性戀文  
化的翻譯 余靜、周韻妮
- 18 專門領域翻譯碩士培養模式及其課程  
設置：以西交利物浦大眾傳媒翻譯  
碩士項目為例 王惠、阮周林
- 32 中國翻譯起源於巫覡：與神靈溝通 邵有學
- 46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A Case Study  
of *Mountains May Depart* Sun  
XICHEN

## 回憶錄 **Memoir**

- 69 香港翻譯學會的發展 (1991-2018) (一) 劉靖之
- 84 稿約凡例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 88 徵求訂戶啟事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 90 訂戶表格 **Subscription and Order Form**





# 從小說《斷背山》中譯本 看同性戀文化的翻譯

余靜 周韻妮

##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homosexuality works in China has been a much neglected field due to the marginality of the gay community there. While extensive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West on this topic, how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has remained largely unknow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rokeback Mountain in 2006,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omosexual literary translations in China. The study reveals a mixture of conflic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ich accentuate, suppress and interfere with different homosexual elements in the novel. Three factors are found tha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onflicts in strategies: the rigid censorship of sexual description of homosexuality, the translator's perception of the homosexual community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marriage.*

同性戀文化近幾十年來在西方非常普遍，有關西方同性戀文化和文學作品的研究在中國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由於不存在同性戀社會運動的背景和同性戀社會群體的基礎，現代文學中的同性戀話題，主要出現在不被主流社會關注的作品中（周湘斌2012: 223）。同性戀文學在中國的邊緣地位在翻譯研究中則更為明顯，目前國內翻譯研究領域探討同性戀文學翻譯的研究對同性戀題材的作品雖偶有涉及，但

關注同性戀文化翻譯的研究則非常罕見。安妮·普魯(Annie Proulx)的小說《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無疑是近年來同性戀文學中最受關注的作品之一。《斷背山》小說中譯本最早由臺灣譯者宋瑛堂譯出,2005年在臺灣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購買了這一譯本的版權,2006年收錄在《近距離:懷俄明故事》、《斷背山》、《斷背山 懷俄明故事集》三本文集中出版。這一版本是《斷背山》在中國大陸的官方譯本,也是唯一正式出版的譯本,十年間在中國大陸已經再版至少5次,是目前在中國影響較大的同性戀文學作品之一。本文擬考察這一譯本中同性戀文化的翻譯策略,考察西方的同性戀文學作品進入中國的過程中,譯者究竟採用何種翻譯策略來處理作品中的同性戀文化,這些策略如何影響作品中的同性戀文化的面貌,而譯者的翻譯策略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 一、同性戀文學的翻譯策略研究

同性戀文化翻譯研究屬西方性別翻譯研究、LGBT翻譯研究、酷兒(Queer)翻譯研究的分支,無論在身份認同還是文化研究等領域都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sup>[1]</sup>。研究發現,譯者/出版社在處理同性戀題材和同性戀作家作品時,大致會採取以下策略來處理同性戀文化:

壓制策略。對同性戀文化的壓制策略既包括文化層面上的譯介壓制,也包括文本和副文本層面的改寫、誤讀和刪除,藉此弱化、扭曲或是抹殺同性戀文化的存在。具體做法,一是在引進翻譯作品的時候,忽視或是拒絕譯介同性戀題材和同性戀作家的作品,造成Harvey(2000: 148)所說的“翻譯匱乏”的現象,即同性戀題材和同性戀作家的作品在主流異性戀文化的壓制下被隱身或雪藏。二是在文本

和副文本層面，弱化或徹底抹殺作品裡的同性戀文化痕跡，或是扭曲/改寫同性戀文化，使之符合甚至變身為主流異性戀文化。Hutchens (2007) 研究發現，Rybowski 在把Allen Ginsberg的詩歌譯入波蘭語的過程中抹殺了裡面所有指向詩人同性傾向的痕跡。三是譯者有可能直接現身作品中，以點評加注等文本手段來批評並打壓同性戀文化。對臺灣小說《荒人手記》英譯本的研究發現，譯者在譯文中直接增加一些負面的表示價值判斷的詞來表達其對同性戀文化的抵觸和批評（陳曉倩，朱玉彬 2015: 73-74）。

強化策略。通過各種方式來強化凸顯同性戀文化，既包括文化層面的引進、譯介和宣傳，也包括文本和副文本層面對同性戀文化元素進行強調、明晰和彰顯，以期借翻譯來顛覆主流文化對同性戀群體的刻板印象，為包括同性戀在內的LGBT群體發聲和爭取權利。具體做法有三種。一是推進同性戀作家、同性戀譯者以及同性戀題材的作品/譯作的出版，消除同性戀作品的“翻譯匱乏”。二是翻譯策略層面對作品中的同性戀元素進行細讀，在譯本中明晰化和強化這些元素，凸顯作品的同性戀主題或是作者/譯者的同性戀身份。三是採用陌生化手法來翻譯原文裡對同性戀形象的刻板表現，顛覆讀者對同性戀的看法。例如，Keenaghan (1998) 的研究發現，美國同性戀詩人Jack Spicer採用強化策略來翻譯西班牙詩人Federico García Lorca作品中的同性戀元素，彰顯作家的同性戀身份。

干預策略。干預策略指的是譯者直接對作品進行干預，將自己對同性戀的看法、立場通過翻譯強行植入作品中，借譯作來改變、影響讀者並傳遞某種信息。做法之一是對經典作品（尤其是非同性戀題材的作品）進行同性戀文化視角的重新解讀，進行酷兒式翻譯，藉此推行同性戀文化。例如，O'Driscoll (2008) 研究發現，Butcher

在翻譯凡爾納的《八十天環遊地球》時將自己對作家和原作的同性戀解讀帶入譯文中，刻意強化、明晰化作品中的同性戀元素，甚至過度解讀作品裡的言外之意，構建出同性戀視角的譯本。這一策略與強化策略的共同點在於，二者都傾向於凸顯作品的同性戀元素，區別在於，強化策略是將譯本原本就有的或是隱含的同性戀因素明晰化或是使之更為奪人眼球，而干預策略則更多是從無到有，譯者對非同性戀作品進行同性戀化解讀式翻譯，或是將譯者自己對同性戀文化的某種解讀、觀點和立場帶入譯作中，試圖將自己的看法通過譯作傳遞給讀者。

研究發現，譯者和出版社壓制，弱化或是抹殺同性戀文化，大多出於三個原因：審查政策的需要，迎合主流讀者的對同性戀的負面認知（Hutchens 2007: 980）以及譯者自身的恐同立場（Palekar 2017: 12）。一般說來，在同性戀文化社會認可度較高，文化審查較為寬鬆，以及譯者自身是同性戀或是對同性戀文化認知較為充分和正面的情況下，則有可能採取強化翻譯策略。而譯者如果有鮮明的“活動家”（activist）立場，有較為明確的文化意圖和較多的翻譯自主權，期待通過譯作來影響改變目標語文化對同性戀文化的認知的情況下，則更有可能採取干預策略。當然，文本層面對同性戀因素翻譯策略的界定和解讀需要結合譯文的整體翻譯策略和副文本策略綜合考慮，並結合譯本置身的社會歷史背景和譯者的意圖，否則容易出現以偏概全的情況。例如，小說《斷背山》的越南語譯者採取了非常徹底的本土化策略，改變故事發生的年代背景，使用隱化策略來處理同性戀情節，但其目的並非要抹殺同性戀文化，而是想要通過這種策略來弱化文本給目標語讀者帶來的文化疏離感，引導讀者關注目標語文化而非源語文化的同性戀群體（Loc 2011: 123-124）。

## 二、《斷背山》中同性戀文化的翻譯策略

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考察《斷背山》中的同性戀文化因素的翻譯。首先，英文原文作者並不屬於同性戀群體，在作品中對同性戀文化基本上採取較為客觀中立的態度，採用十分精簡的寫實手法（林中英2014: 333），既不批判也不宣揚同性戀，無意於對讀者的閱讀進行隱形引導（余瓊2013: 31）。本文關注的第一點，就是看譯本是否對原文這種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保留。其次，原文有大量關於同性戀恐懼症的描寫，作者認為此書“是一個毀滅性的鄉村同性戀恐懼症的故事”（Proulx, McMurtry & Ossana 2005: 130）。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簡稱“恐同”，是指對同性戀者和同性戀行為的恐懼、憎恨或迫害傾向（李濤2015: 144），既體現在個體對潛在的同性戀欲望的焦慮，也體現在個體對異性戀自我形象的挑戰和崩潰（王晴鋒2013: 60）。恐同既可能發生在異性戀者身上，也可能發生在想掩飾自己同性戀性傾向的同性戀者身上（陳瑋2015: 222）。《斷背山》中既有對一般社會環境恐同的細緻描寫，也勾勒了兩位主角自身的恐同態度。譯者採取何種策略來處理這兩方面的恐同描寫，是本研究關注的第二個焦點。此外，小說中既有大量對同性戀的性描寫，也有對異性戀的性描寫，“相對於主流大眾的口味而言太過直白露骨”（Proulx、McMurtry & Ossana 2005: 132），並因此而倍受批評。譯者處理這兩類性描寫，是否採取區別對待的態度，則是本研究關注的第三個焦點。本研究採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從兩個方面著手，一看原文中典型的同性戀元素在譯文中採取何種策略進行翻譯，二看譯者對原文中同性戀元素和異性戀元素是否採取差異化的翻譯策略，揭示譯者對同性戀文化的翻譯策略。

### A. 壓制策略：抹殺同性性描寫

《斷背山》中共有九處性行為的描寫，其中七處是恩尼斯和傑克的同性性行為，兩處是恩尼斯和妻子阿爾瑪的異性性行為。人民文學譯本對這七處同性性行為描寫全部進行了刪除或簡化，如下例（此處以及下文所有例子的劃線都系筆者所為）：

- 例1. It was big enough, warm enough, and in a little while they deepened their intimacy considerably. Ennis ran full-throttle on all roads whether fence mending or money spending, and he wanted none of it when Jack seized his left hand and brought it to his erect cock. Ennis jerked his hand away as though he'd touched fire, got to his knees, unbuckled his belt, shoved his pants down, hauled Jack onto all fours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clear slick and a little spit, entered him, nothing he'd done before but no instruction manual needed. They went at it in silence except for a few sharp intakes of breath and Jack's choked "gun's goin' off;" then out, down, and asleep. (Proulx 2000: 259-260)  
床墊夠大夠暖，不一會兒兩人的親密程度顯著加強，惟一聲響只有幾下驟然吸氣聲以及傑克憋氣說“要走火了”，隨後靜止，倒地，熟睡。（宋瑛堂 2006: 220）

此處描寫的是兩位主人公在山上第一次發生性行為，也是全文同性性描寫中最詳細直白的一處。這次性行為之後，兩人的關係有了質的改變。原文劃線處的大段性描寫被悉數刪去，剩下的部分只是比較隱晦地暗示兩人發生了關係，粗心的讀者可能都不會明白此處究竟發生了什麼。原文中並不露骨的同性性描寫，也遭到了同樣的刪節，如下例：

- 例2. They went off in Jack's truck, bought a bottle of whiskey and within twenty minutes were in the Motel Siesta ouncing a bed. (Proulx 2000: 265)  
他們開著傑克的卡車離去，買了一瓶威士忌，不到二十分鐘雙雙住進了午睡汽車旅館。（宋瑛堂 2006: 224）

此處描寫的是兩位主人公多年後再次見面的情景。原文多處或明或暗提到兩人的性行為，此處的“jouncing a bed”是全書最為委婉地表達二人發生關係的一處描寫。譯文原本可以不動聲色地直譯為“震動床鋪”，但此處還是毫不留情地遭到了刪節。全書另外五處涉及同性性行為的描寫，無論露骨與否，全部遭到刪減。出人意料的是，書中兩處異性性行為的描寫非常露骨，但卻被悉數保留。請看下列：

- 例3. “I guess,” said Ennis, slipping his hand up her blouse sleeve and stirring the silky armpit hair, then easing her down, fingers moving up her ribs to the jelly breast, over the round belly and knee and up into the wet gap all the way to the north pole or the equator depending which way you thought you were sailing, working at it until she shuddered and bucked against his hand and he rolled her over, did quickly what she hated. (Proulx 2000: 262-263)
- “再說吧，”恩尼斯說著一手由下往她衣袖上摸，搔動絲柔的腋毛，然後緩緩將她放平，手指從她的肋骨移動至軟似果凍的胸部，劃過圓肚皮與膝蓋，向上伸進濕縫，一路伸至北極或赤道，全看你認為自己在往哪個方向航行，一直到她顫抖著抵住恩尼斯的手，恩尼斯才將她翻身過來，快速辦完她討厭做的事。(宋瑛堂 2006: 222-223)

這段是描寫恩尼斯和妻子的性行為，直白露骨，卻一字未刪全部保留。不難看出，譯本顯然對異性性描寫網開一面，而對同性性描寫實施了壓制策略，通過刪除和簡化來沖淡作品的同性戀元素，至少是同性戀文化涉及的性元素。

書中對同性性行為描寫進行的厚此薄彼的審查策略，可能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書中異性性行為描寫涉及的異性婚姻的婚內性行為，描寫雖然露骨卻不違背主流文化的道德價值觀念，因而得以保留；而書中同性性行為則遊離於婚姻之外，是對合法婚姻的背叛，從多個層面違背了主流價值觀，故遭到刪除；二是需要顧及讀者對同性

戀性描寫的接受。《斷背山》從本質上講是異性戀作家給異性戀讀者講述的同性戀故事，無論是電影還是小說（包括譯文），其受眾都是主流價值觀影響下的大眾群體，而不是針對同性戀群體的小眾電影或出版物。然而，中國大陸對同性戀文化的瞭解度和接受度並不高。建國後，中國大陸一度對同性戀採取嚴厲禁止的態度，視之為“低級趣味”甚至是“流氓行為”（王歌雅2008: 242）。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縱欲無度、混亂不正常的群體，甚至有學者撰文呼籲，應該將“homosexuality”譯為“同性性行為”而不是“同性戀”或是“同性愛”以正視聽（潘國森2004）。這種態度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無法接受同性性描寫，認為同性性行為是可恥的甚至是犯罪。如果保留同性性描寫，譯著即便通過出版審查也可能引起較大爭議，而且有可能會強化同性戀就是同性性行為的刻板印象，進而影響譯著的接受，損害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針對同性戀性描寫採取的壓制策略很可能是出版社所為。筆者比較了這一譯本與2005年在臺灣出版的版本，發現臺灣版保留了全書所有的性描寫。譯者宋瑛堂在跟筆者的交流中也確認了這一點，即大陸版本中的修改並非出自他本人，而是由出版社決定。這種厚此薄彼的審查制度屬於屬壓制策略的一種，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大陸主流文化對同性戀文化的認知和態度：同性戀文化也許可以譯介，但同性戀性文化則必須諱莫如深，嚴禁涉及。不過，出版社的這種刪改雖然弱化了同性戀文化裡“性”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小說“戀”的成分——小說中還有大量對兩位主人公之間感情的細膩描寫，都被譯者毫無刪改、細緻入微地翻譯了出來。這樣一來，原作展現的是反映西方價值觀的“愛”和“性”合一的同性愛情觀；而在中譯本中，性文化的缺失則使得小說裡的同性戀文化變成了重“愛”輕“性”的中國傳統愛情，傑克和恩尼斯的感情也似乎更接近淒美



的“愛情悲劇”，使得異性戀讀者更容易從異性戀的世界觀來理解並接受同性戀文化，對他們的感情產生認可和同情。

## B. 強化策略：凸顯恐同心理

恐同作為一條線索延續著小說的始終，既體現在書中異性戀人物對同性戀主人公的態度上，也體現在兩位主人公對自身的認知中。恩尼斯因自己對同性戀的恐懼和小時候看到的同性戀者被異性戀者虐待至死的畫面，二十年來一直不敢正視內心和感情，而傑克雖有心抗爭終歸還是逃脫不了被異性戀者打死的命運，小說的戲劇衝突通過恐同加以展現並達到巔峰。人民文學版譯本對原文中若隱若現的恐同心理進行了明晰化和強化處理，請看下列：

例4. “Friend,” said Jack. “We got us a fuckin situation here. Got a figure out what to do.” “I doubt there’s nothin now we can do,” said Ennis. “... You and me can’t hardly be decent together if what happened back there” — he jerked his hea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partment — “grabs on us like that. ...” (Proulx 2000: 267)

“朋友，”傑克說，“我們給自己捅出婁子了。非想辦法不行了。”

“想得出辦法才怪，”恩尼斯說。“...你和我一見面成那副德性”——他擺頭朝自己公寓的方向指去——“抓狂似地黏成一團，兩人在一起的時候還像話嗎？...” (宋瑛堂 2006: 226)

此處是離別斷背山四年後重逢，傑克驅車來看恩尼斯時的對話，二人明瞭對彼此的感情，但也知道兩人的處境異常困頓。恩尼斯深受主流文化恐同觀念的影響，雖然無法抑制自己和傑克之間的感情，但從理智上一直抵制這種感情，對自己的行為既羞愧內疚又無比恐懼，因而盡量避免直接提到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即便提到也是表述得遮遮掩掩

十分委婉。事實上，這種隱晦的表達方式貫穿整個小說始終，如兩人之前在斷背山上的行為被稱爲是“what happened there”，兩人現在的舉動是“hardly be decent”，都較為間接委婉。譯者採用了明晰化和增譯法兩個策略來凸顯恩尼斯的這種恐同心理，點明“之前那樣”是“你我一見面成那副德性”，“抓狂似的黏成一團”。“那副德性”、“抓狂似的黏成一團”這些細節都是譯者採用明晰化策略添加進去的，突出體現了恩尼斯對兩人行爲的鄙夷和輕視。“You and me can't hardly be decent together”在原文是陳述句，表明說話人在陳述事實“你和我很難體體面面在一起”，譯文中這句被譯爲反問句“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還像話嗎？”，語氣間充滿對兩人戀情的質疑和否定。原文裡人物對話字裡行間有意無意回避正面探討兩人的感情，凸顯的是人物的迷茫，困惑，恐懼和矛盾，譯文則把這種回避明晰化，增加了一系列負面的字眼，抹殺了這種迷茫、困惑和矛盾，強化了人物對自身行爲的恐懼和不安，凸顯了恩尼斯的恐同心理。試比較新浪微博上流傳頗廣的網絡譯本的翻譯：

- 例5. “夥計，”傑克說。“既然這樣，我們必須得弄清楚下一步該幹什麼。”  
“恐怕我們什麼也幹不了。”埃尼斯道。“——就算時光倒流，咱們還是不能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他朝自己公寓的方向甩了甩腦袋，“我們會被抓住。——”（微雨寒梅2006）

相比之下，這一譯本中，很難看到人物在恐同心理重壓下的迷茫，恐懼和無奈。恩尼斯的隱晦的表達蘊含的豐富含義被消解得一乾二淨，因為兩人之間的困難被定義爲無法“正大光明”地在一起，暗示兩個人現在是“偷偷摸摸”的婚外戀，擔心的是“被抓住”，同性戀的困境被簡單闡釋爲婚外情，貫穿始終的恐同主題在這裡自然也被消解得無影無蹤。

人民文學譯本對恐同心理的強化策略同樣出現在對異性戀人物恐同心理的刻畫上，網絡譯本則毫無例外對恐同心理採取弱化的策略：

例6. “Once burned,” he said, leaning against the counter, feeling too big for the room.

“You still go fishing with that Jack Twist?”

“Some.” He thought she’d take the pattern off the plate with the scraping. (Proulx 2000: 270)

【人民文學版】“一朝被蛇咬啊，”他邊說邊倚著操作臺，感覺廚房容不下他。

“還跟那個傑克·特威斯特去釣魚嗎？”

“偶爾。”以阿爾瑪刮餐盤的狠勁，恩尼斯認為盤上的花紋會被她刮掉。(宋瑛堂 2006: 229)

【網絡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斜靠著櫃檯說，覺得這房間好小。

“你現在還跟傑克·崔斯特出去釣魚嗎？”

“有時候會去。”他覺得她要把盤子上的花紋都擦掉了。(微雨寒梅 2006)

此處恩尼斯的前妻阿爾瑪邀請恩尼斯來她再婚的新家過感恩節，多年不願面對事實的她終於和恩尼斯當面對質。阿爾瑪建議恩尼斯再婚，恩尼斯聽到後“感覺廚房容不下他”，凸顯了他面對妻子提議時的感受：壓抑，無處容身。而阿爾瑪提起傑克時掩飾不住的反感，用的是“那個傑克”，她的反應是使勁兒刮盤子，譯者這裡增譯了“狠勁”二字來譯“with the scraping”，寥寥數語強化了異性戀妻子對同性戀丈夫的怨恨和不滿，對同性戀人群的厭惡。相比之下，網絡譯本則輕描淡寫地把兩個人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弱化，如把“feeling too big for the room”譯成“覺得房間好小”，“that Jack”譯成“傑克”，“scraping”譯成“擦掉”，使得同性戀和異性戀之間水火不容、劍拔弩張的交鋒變成了平平淡淡的兩個人之間的家常閒聊，更使得接下來恩尼斯的爆發顯得有些突如其來，無緣無故。

人民文學譯本採取強化策略，濃墨重彩地凸顯了作品中同性戀不得不面對的雙重恐同心理。一方面異性戀者出於種種原因對同性戀者的反感、鄙視、厭惡甚至仇恨，使得同性戀者的處境非常艱難；另一方面，同性戀者透過主流異性戀的視角來審視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性取向遮遮掩掩，對自我否定和質疑，卻又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在外界的步步緊逼和壓迫下，他們退縮進社會陰暗隱蔽的角落裡。同性戀者裡外夾擊、夾縫生存的困境在譯者的筆下得到明晰化和加強，進一步凸顯了這一人群的邊緣地位。

### C. 譯者立場：中立抑或拷問？

本研究發現，譯者的整體翻譯策略傾向於以原文為導向 (source-oriented)，雖對人物的恐同心理有強化的傾向，但總體而言情節無刪除，全書無漏譯或是明顯的改寫，較好地體現了原文作者的客觀中立的立場。雖然譯者竭力貼近原文，亦步亦趨地再現原文，筆者還是發現，譯者字裡行間仍不經意流露出自己對同性戀人物和同性戀文化的看法和立場，如下例：

例6. Ennis guessed she was going to ask him to get her a pack of cigarettes, bring him back sooner. ...

“Ennis——” said Alma in her misery voice, but that didn't slow him down on the stairs. (Proulx 2000: 264)

恩尼斯猜太太準備叫他買包香煙給她，希望提醒他早點回家。...

“恩尼斯——”阿爾瑪以痛苦的聲音說，但丈夫並未因此減緩下樓的腳步。(宋瑛堂 2006: 224)

此處書中的兩位主人公在當時的環境下無法生活在一起，斷背山後兩個人都選擇了與異性結婚甚至生子。此處是恩尼斯和傑克多年後重

逢，二人一見面抑制不住感情流露，被恩尼斯當時的妻子阿爾瑪看在眼裡。她心緒難平，似乎是想用買煙的方式提醒恩尼斯他還有家有孩子。譯者把人稱代詞“she”、“him”譯為“太太”、“丈夫”，點明恩尼斯雖是同性戀者，但他既然選擇了異性戀婚姻就必須要承擔家庭責任，妻子和孩子是他無法逃避的道德枷鎖。譯者似乎時時處處不忘記提醒讀者兩位主人公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多處將與二人有關的人稱代詞譯為凸顯人物身份責任和家庭關係的名詞，如將“had her pregnant”譯為“妻子已懷孕”，“sitting on his lap”譯為“坐在丈夫的大腿上”、“he could see it”譯為“做爸爸的他認為顯而易見”等。

譯者對人稱代詞採取的策略已經超出明晰化翻譯的範疇，可以被視為是作者對文本直接進行干預，將自己的解讀帶入譯本中，因而也可以被視為是上文提到的“干預策略”的一種。譯文中的人稱代詞被譯為蘊含家庭婚姻身份和責任的名詞，兩位主人公似乎被譯者放在了主流價值觀的對面，被不停拷問：作為丈夫，作為父親，你應該如何抉擇？應該承擔何種責任？譯者的這種干預很可能是譯者自身對同性婚姻認知的一種無意識的流露。筆者在與譯者進行交流的過程中發現，譯者支持同性戀婚姻，對同性戀者通過異性婚姻來掩蓋自身取向的做法採取否定態度，而譯文中的干預策略無疑折射出譯者對這種扭曲婚姻的看法。同性戀的“非生育性”和其對傳統家庭模式的挑戰歷來為人詬病，同性戀群體締結的異性婚姻往往會給無辜的妻子和孩子帶來無盡的痛苦和折磨，而同性戀者在家庭和愛情之間進退兩難，備受煎熬。譯者對譯文進行的干預，一方面在提醒同性戀者他們肩上對家庭的責任，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凸顯了同性戀者面臨的道德困境和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斥責。干預策略與之前的強化策略一起，細緻深入地勾勒了同性戀群體面臨的社會、家庭、道德和倫理困境，使得讀者對其困境感同身受，激發讀者的同情心。

### 三、結語

本文對《斷背山》小說中譯本的翻譯策略進行研究發現，一方面出版社對同性戀性描寫採取了厚此薄彼的審查策略，壓制了同性戀性文化的存在感，另一方面，譯者對作品中的同性戀文化，尤其是同性戀群體所面臨的社會和道德困境，採取了強化策略和干預策略，凸顯了小說的同性戀主題。二者之間的矛盾凸顯了當前同性戀文化和文學在中國大陸的生存現狀。一方面，同性戀文化漸漸興起，逐漸得到主流文化的更多的關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斷背山》的翻譯，可能主要是受到電影《斷背山》席捲全球的影響，雖然電影未能在大陸公映，但不可否認的是，《斷背山》這樣的同性戀題材的文學作品能夠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的中國最高等級的文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再版多次，這本身就說明同性戀文學在中國不再是黑暗角落裡的文學棄兒，而逐漸進入主流文化的視野。另一方面，同性戀作品仍然面臨較為嚴格的出版審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的社會文化對同性戀都是打擊和排斥的，同性戀處於“符號性滅絕”的狀況（魏偉 2010: 86）。對異性戀文化和同性戀文化厚此薄彼的審查制度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存在並影響同性戀文學書寫、出版和翻譯的各個方面。

就同性戀文學翻譯而言，譯者既面臨著機遇也面臨困境和挑戰。Harvey (2000: 159) 認為，譯者選擇翻譯同性戀題材和同性戀作家的作品，明確展現同性戀經歷和掙紮，這本身就能夠幫助同性戀讀者構建內在的身份認同。然而，譯者需要面對主流社會固有的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需要面對同性戀者自身和周圍環境無處不在的恐同心理，更需要面對自身對同性戀文化的立場和態度。譯者往往需要透過異性戀的

視角來重新審視同性戀文化和人物來確保譯作的可讀性。早期同性戀被人們視為病態、畸形的愛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媒體對愛滋病“污名化”的報道往往直指同性戀群體，加劇了人們對同性戀的歧視和偏見（陳靜 2015: 240）。同性戀的亞文化特質決定了同性戀文學的邊緣地位，譯者需要有強烈的性別意識和敏感性，才能處理好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疏離感和敵意，避免譯作成為恐同的代言。此外，同性戀文學面臨著主流社會婚姻觀、家庭觀、道德觀的倫理挑戰。當同性戀和異性戀的觀念在作品中發生衝突時，譯者，尤其是異性戀譯者，很難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往往會不由自主凸顯自己對某個具體問題的立場，對同性戀文化的某一個方面進行價值判斷甚至批判。譯者需要對同性戀群體有深刻的瞭解，同時具有敏感的性別意識，對作品中涉及到同性戀文化有深刻的認識，才能使得譯作具有更強的使命感，為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發聲，營造更為寬容，更為多元化的文化和社會。

**鳴謝：**感謝《斷背山》譯者宋瑛堂先生在本文撰寫過程中回答筆者的問題並提供資料方面的幫助。

## 注釋

- <sup>[1]</sup>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西方非常豐富，具體可以參見“酷兒翻譯——翻譯酷兒”(Queering Translation – Translating the Queer)網站列出的參考書目 (<https://queertranslation.univie.ac.at/bibliography/>)。

## 參考文獻

- Harvey, K. (2000). "Gay community, gay identity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edaction* 13.1: 137-65.
- Hutchens, J. (2007). "Translating the queer voice: Problems with Polish translations of Ginsberg's 'America' and 'Messag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40.6: 979-994.

- Keenaghan, E. (1998). "Jack Spicer's Pricks and Cocksuckers: Translating homosexuality into visibility". *The Translator* 4.2: 273-294.
- Loc, P. (2011). "Western Others (And 'Other' westerns)—Translating *Brokeback Mountain* into Vietnamese culture". In *Re-engendering Translating: Transcultural Practice, Gender/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ity*. Ed. Christopher Larkosh.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11-126.
- O'Driscoll, K. (2008).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gays: Retranslating Jules Verne from a queer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ies. Selected Papers of the CETRA Research Semina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De Crom. Leuven, 1-31.
- Palekar, S. (2017). "Re-mapping translation: Queerying the crossroads". In *Queer in Translation*. Ed. B.J. Epstein and Robert. Gillet. New York: Routledge, 8-24.
- Proulx, A. (2000). *Close Range: Wyoming Stories*.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and Sydney: Scribner.
- (2005). "Getting Movied". In *Brokeback Mountain: Story to Screenplay*. Ed. Annie Proulx, Larry McMurtry and Dianna Ossana. New York: Scribner, 129-138.
- 宋瑛堂(譯)(2006),《近距離：懷俄明故事》，安妮·普魯(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陳靜(2015),《媒介偏見 新聞群組織行為表像與政治原動力下的機制呈現》，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陳曉倩，朱玉彬(2015),〈《荒人手記》及其英譯本中同性戀話語“態度”資源的比較〉，《宿州學院學報》7: 72-75。
- 陳璋(2015),《微人格心理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李濤(2015),〈拜厄特四部曲中的同性戀敘事研究〉，《外國文學》4: 143-149。
- 林中英(2014),《頭上彩虹》，北京：作家出版社。
- 潘國森(2004),〈從語源學和語義學看“Homosexuality”的中譯謬誤〉，《中國性科學》2: 4-7。
- 王歌雅(2008),《中國親屬立法的倫理意蘊與制度延展》，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 王晴鋒(2013),〈“恐同症”的根源——基於宗教、現代性和文化的闡釋〉，《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59-64。



魏偉 (2010), 〈從符號性滅絕到審查性公開：《非誠勿擾》對於同性戀的再現〉, 《開放時代》2: 83-99。

余瓊 (2013), 〈《斷背山》：再議“文學觸電”〉, 《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 30-32。

周湘斌 (2012), 《性的生理、心理與文化》, 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

### 作者簡介

余靜, 女, 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博士生導師; 香港理工大學翻譯學博士。研究方向: 翻譯理論、文學翻譯。電郵地址: yujinginbox@sjtu.edu.cn

周韻妮, 女, 杭州新東方進修學校講師。研究方向: 文化翻譯, 文學翻譯。電郵地址 526241767@qq.com

**專門領域翻譯碩士  
培養模式及其課程設置：  
以西交利物浦大眾傳媒翻譯碩士項目為例**

王惠 阮周林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ing of Master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hereafter MTI) programmes in mainland China in 2007, there has been a soaring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MTI at universities in China. Up till 2015, the enrollment number of MTI students has jumped to 35,965. However, the MTI programme fails to meet the present market needs in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due to its “multi-competent” training mode, which is designed to produce graduates capable of taking on a variety of translation tasks. Considering the demands of the increasingly segmented translation job market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English major programmes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Subject-matter Knowledge + Translation Training mode in MTI training. Taking learners, translation trainers and translation institutes as its points of departu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 ways for curriculum design for the MA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training programm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A in Mass Media Translation of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 一、引言

自200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設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首批15所高校獲准建設MTI碩士項目以來，MTI課程得到蓬勃發展。截止2015年，全國已有205所高校建立了MTI碩士課程，MTI總招生人數達35,965人(平洪2016: 51)。加上近十年來已經畢業的學生，MTI應用型碩士培養的規模之大可以想見。那麼，這些已經畢業或即將畢業的碩士研究生與翻譯市場之間的需求對接情況如何呢？

崔啟亮(2017)對MTI學生的翻譯能力和就業情況做過調查，其中有關企業對“新入職翻譯碩士(MTI)員工的主要不足”的回饋顯示，在有翻譯崗位的59家企業中，48家企業選擇了“專業知識缺乏”(經與作者求證，此處“專業知識”意指“專門領域知識”)。這項調查結果也回應了崔啟亮(2016: 73)於2015年7月到10月對72家國有企業對語言服務的需求調查，調查顯示語言服務公司(或者更準確地說，譯員)缺乏專業知識是企業選擇語言服務供應商的最大障礙。黃友義(2010: 49)早在總結中國翻譯市場的需求重點時，就明確指出“專業翻譯人才緊缺”是其中重要一環(作者注：這裡的“專業翻譯人才”其中一個含義指“具備專業學科知識的翻譯人才”)；事實上，對主題專業知識的缺乏已經得到很多翻譯從業人員的共鳴。李德鳳(2012: 161)對香港的42位職業譯者做過調查研究，調查發現57.1%的譯者認為自己在做譯者之初最欠缺的知識是主題專業知識。而在翻譯雇主看來，主題專業知識甚至比翻譯技巧重要得多(Kelly 2005: 76)。

很明顯，翻譯市場在呼喚專門領域的翻譯人才，具備一定主題專業知識不僅反應翻譯畢業生的欠缺，更代表了市場對譯者的期待，然而MTI培養模式似不能滿足市場所需，這部分歸因於MTI的培養目標和

課程設置：MTI強調培養“具有熟練的翻譯技能和寬廣的知識面，能勝任不同專業領域所需的翻譯人才”（趙軍峰、穆雷 2013: 80），相應地，其課程設置要求是“兼顧翻譯範圍的廣泛性和譯者從業的多樣性”（文軍、穆雷 2009: 94）。這種“多能式”翻譯培養導致的直接結果是，MTI畢業生人群雖然日益壯大，卻不能滿足市場對專門領域譯者的需求。

## 二、專門領域翻譯培訓的可行性

翻譯專業的學科發展不禁讓我們聯想到英語專業的教育發展道路，可以說今天翻譯學科發展遇到的“同質化培養”（劉和平 2017），瓶頸同樣也阻礙著英語專業教育的發展。根據曲衛國（2016），2000年版的《英語專業的教學大綱》一書，對英語專業的培養目標是這樣設定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培養具有扎實的英語語言基礎和廣博的文化知識並能熟練地運用英語在外事、教育、經貿、文化、科技、軍事等部門從事翻譯、教學、管理、研究等工作的複合型英語人才”。十多年後，中國的英語專業教學狀況如何呢？束定芳（2016）指出，當前英語高校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幾乎所有高校都開設了英語專業，培養模式幾乎千校一面，沒有特色可言，其畢業生更是連續多年高居就業困難排行榜前三名。束定芳（2016）繼而指出，社會上對既懂英語又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人才的需求還是比較大的，因而，英語專業應該與某一具體專業結合起來，培養懂某一專業領域國際規則的高水準語言技能型人才，換而言之，就是英語+某一特色專業的培養模式。

借鑒英語專業教育的發展和束定芳（2016）的建議，如果將我們的翻譯培養模式改為“翻譯某一特色專業”，亦即“翻譯+專門領域知識”的培養模式，是否可以更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呢？

但隨即而來的問題是，專門領域的翻譯培養會影響未來學生就業嗎？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早在1984年，德國學者Thiel就提到對專門領域翻譯學生未來就業的擔心(Thiel 1984, 引自Kiraly 1995: 17)。專注於某一領域，譬如傳媒，是否會將譯員局限在某一領域的翻譯圈子裡，而找不到其他領域的翻譯工作呢？此方面的憂慮可能源於翻譯工作本身觸及領域的廣泛性，或許這也可部分解釋為何MTI碩士課程“以培養多能為主”作為其培養目標。

事實上，市場將翻譯培訓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市場需要專門領域譯者，而另一方面，專門領域翻譯比較局限、可能面臨就業困難的問題。很明顯，能否解決這個矛盾是建立專門領域翻譯培養模式的關鍵。經過市場調查和對自身情況的考量，我們認為方法之一是，選擇就業面廣的專業領域與翻譯相結合。在此思想引導下，我們從眾多專業中，選擇建立(大眾)傳媒翻譯碩士項目。傳媒的涵蓋面廣，包含的領域寬泛，而且傳媒業發展勢頭強勁。荷蘭傳媒研究學者Mark Deuze教授在演講中(學術講座，2015年10月23日)提到“生活中媒體無處不在”，“我們整個社會不是與媒體共存，而是生活在媒體之中”(筆者譯)。特別是近年來，新媒體的盛行，移動網路的運用，讓信息透過媒體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全球化背景下，媒體傳播使用的語言和符號越趨多樣化，對於傳媒翻譯技能需求有了大幅增長。我們相信，選擇就業領域相對較寬、適應範圍廣的專門領域，將在某種程度上緩解專業領域譯者就業難的問題。

事實上，部分MTI院校已經開設了專門領域的翻譯課程，如商務翻譯、法律翻譯等等；更有一些學校因地制宜，設置了與本學校特色專業結合的翻譯研究方向課程，例如西北師範大學在翻譯市場調查基礎上，建立的市場驅動下的翻譯碩士培養模式(曹進、靳琰 2016)；廣東

外語外貿大學建立的以某專業領域翻譯為培養方向（如傳媒翻譯、商務翻譯）的課程。但這些課程或者過於單一（只設置翻譯技能課程），或者各課程之間缺乏有機結合。雖然翻譯培訓師們把主題專業知識列在與語言技巧同樣重要的位置（Sharkas 2013: 52），但至此為止，對有關專門領域翻譯培訓課程及其課程設置還鮮有系統研究，而此方面的研究對翻譯項目培養的譯員品質影響最為直接（Li 2001），本文將嘗試在此方面有所貢獻。

### 三、專門領域翻譯碩士培養模式及其課程設置

專門領域翻譯碩士培養模式旨在培養某一特定領域的譯員，與“多能式”培養的差別在於其對“特定領域”的專注性。這一專注性包含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特定領域的相關知識，也包括特定領域的工作環境、文化及有關社會環境（特別是翻譯行為可能涉及到的社會因素），以及此領域相關文本的翻譯技能。從這個意義上說，設立專門領域翻譯碩士課程的目的是培養懂得一定領域的專門知識，熟悉特定專業的工作環境，並能運用特定翻譯技能完成翻譯任務的譯員。需要澄清的是，這並不是要求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既要學習翻譯技巧，又必須同時瞭解此專業領域研究生掌握的專業知識。這既不太可能也沒有必要。在專門領域翻譯碩士課程中，培養該領域翻譯技能是核心，所有有關該領域知識的課程都是為熟練掌握特定翻譯技能服務的。

要培養合格的專門領域譯員，其中一個關鍵環節是做好課程的課程設置。Kearns（2006）認為學校的專業翻譯課程設置需要從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和環境分析（situation）兩方面考慮，其中需求分析主要指翻譯課程利益人的需求（如學生、市場等）；而環境分析可

從社會 (societal)、課程 (project)、(培訓)機構 (institutional)、學習者 (learner)、教師 (teacher) 等方面考慮。<sup>[1]</sup> 其中市場對譯者專門領域知識的需求以及社會因素對課程設計的影響，本篇開頭已做論述，這裡不再贅述；而項目因素更多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 (Kearns 2006: 168-169)，已超越本文研究範圍，也不予討論。鑒於此，本文將主要從培訓機構 (學校)、學習者、以及翻譯教師 (師資配備) 三個方面做需求和環境分析，探討課程設置的影響因素。

學習者的現有知識 (環境分析的一部分) 和需要學習的知識 (需求分析) 是課程設置的重要因素。從學習者角度考慮，學習者已有的知識結構可以作為課程起點，找准起點，才能做好學生已有知識與所需學習知識的對接。當前翻譯碩士主要的招收對象來自英語語言文學或翻譯專業，但雖然如此，學生的語言能力普遍不高，主題專業知識相對缺乏幾乎是各高校翻譯碩士生存在的共同問題。那麼，學習者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翻譯能力才能滿足市場所需呢？考慮到當前市場在招聘翻譯時的要求表達較為模糊，本文遵循 Gile (2009: 8-10) 對翻譯能力的定義，將翻譯能力分解為專業譯者所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具體地說，專業譯員所應具備的知識包括對工作語言的被動知識和主動知識，前者即語言理解能力，指對語言信息，特別是詞語、節奏、圖像、音樂間細微差別的理解；而後者是語言的表達能力，包括寫作與口頭表達。熟練的語言知識是學習翻譯、做好翻譯的前提條件，但現實情況顯示，語言能力仍然是很多翻譯學生面臨的重大問題 (Nord 2005: 211)。對於碩士階段是否應將學生的語言能力作為培訓的一環，如果要，又該如何提高語言能力，各高校在課程設置時似應給予考慮，因為譯員的雙語 (特別是英語) 熟練程度一直以來都是翻譯雇主最關心的話題。

專業譯者同時需要瞭解文本涉及的主題專業知識，以及可能獲得的輔助性文本和人力資源。遺憾的是，除少數高校外，大部分高校翻譯專業的課程中幾乎沒有涉及主題專業知識，而這一知識儲備卻是翻譯學習者必須具備的重要才能之一 (Anderman & Rogers 2000: 66)。另外，課程設計中，主題知識的廣度和深度如何把握，主題專業知識及其翻譯是否需要邀請業界專家講授，以及由此引起的成本核算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根據Gile (2009: 9)，譯者關於翻譯的陳述性知識是指關於翻譯過程中涉及到的各社會因素，即市場、客戶、約束譯者和客戶，譯者與譯者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知識，關於信息來源、翻譯工具的知識，以及每項翻譯任務中客戶的具體期待等，這些都是可以用文字表述的知識；而程式性知識指具體的行動實施能力，譯者的程式性知識包括譯者獲得特殊知識所需技巧的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決斷能力，掌握現代翻譯技術的能力，以及掌握某些翻譯形式，特別是當地語系化、網頁翻譯、影視翻譯所需的技術技巧能力等等。比較而言，這部分是翻譯能力的核心，而程式性知識是重中之重。因為專門領域的特殊性，在翻譯能力上，與一般譯員相比，對專門領域的專業知識，及其領域涉及的工作規範、社會因素等的瞭解，可以幫助專門領域譯員更深入全面的掌握翻譯技能。換句話說，譯者的行動實施能力(程式性知識)，是以語言的熟練程度、對專業知識、以及翻譯過程中涉及的各因素的具體瞭解為前提的，而後者也需要通過翻譯技能來具體呈現。

考慮到各高校的收生標準不同，學習者自身又各有差異，對照上述四方面的翻譯知識，結合學習者已經具有的知識儲備以及語言能力適當調整，在課程設計時對學生普遍缺乏的和需要學習的知識和技能加以側重，可以加快翻譯能力的培養。



翻譯教學的師資配備、教師資質、教師能否順利完成教學等也直接影響項目的課程設置。另外，從學校環境角度考慮，學校的課室建設，特別是翻譯軟體的配備，學校的圖書館、選課制度等是否適應並幫助翻譯技能的培養都需考量。毋庸諱言，沒有適合的師資和硬體設備，即使設置了適合學生的課程，課程目標也難以達到。

## 四、實例分析：

### 以西交利物浦大學“大眾傳媒翻譯”碩士項目為例

傳媒翻譯已經在很多高校的翻譯碩士課程中佔據了一席之地，或者成為翻譯碩士的一個培養方向。與其他高校不同的是，西交利物浦大學將傳媒翻譯設置為一年半制的碩士學位課程。課程的培養目標是幫助學生深入瞭解英漢傳媒翻譯，培養具有扎實的傳媒翻譯技能、且善於思考善於學習的碩士研究生，以適應迅速發展的傳媒翻譯大環境，同時也為未來從事翻譯研究、尤其是傳媒翻譯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礎。下面我們以此項目為例，說明如何設置課程，以達到專門領域翻譯碩士的培養目標。

#### 4.1 課程設置影響因素分析

課程是針對學習者而設，要設置適合學習者的課程，需要掌握他們缺乏的（環境分析），以及所需學習的知識（需求分析）。針對此，西浦選擇從學生入學要求入手瞭解。傳媒翻譯主要是英漢互譯，課程對學生的入學要求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學業背景，課程要求學生的第一學位專業為英語（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漢語（母語不是漢語的學生）、傳媒研究、大眾傳媒、或新聞專業，其他專業的學生會個別

考慮。其二是英語要求(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課程要求申請人達到雅思考試成績7分(任何一門單科不得低於6.5)，託福(600分/100分)。雅思成績沒有達到7分的學生必須經過學校語言中心的英語強化課程，提高語言技巧；其三是漢語水準(母語不是漢語的學生)，要求申請人通過漢語水準考試五級。各項入學要求顯示，學習者可能來自不同專業，所具備的傳媒專業知識參差不齊；各自不同的語言背景，使得英漢雙語能力亦有參差，但學生的總體英文水準相對較高；這就需要考量課程如何設置才能予以補足學生的知識欠缺，並平衡學生在語言及主題專業知識方面的知識儲備。

專門領域知識缺乏不僅是譯者/學習者的問題，也是翻譯教師的問題，這方面的師資配備因而成了各高校翻譯碩士課程面臨的共同問題。針對這一問題，高校經常採取的解決方法是外聘專家授課。鑒於西浦一直鼓勵跨學科、跨院系合作，課程採取的應對方式是共同授課：即由影視傳媒學院教授傳媒知識課程，英文系則集中授課傳媒翻譯技能，對於一些既涉及傳媒又涉足翻譯的課程，例如“中國文化翻譯”，以及“西方世界中的中國形象”課，項目會考慮兩個系教師合作執教。跨院系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專家聘請所需的成本支出問題。同時，課程採取定期邀請傳媒/傳媒翻譯領域專家做系列講座的方式，以期更好地與傳媒翻譯市場需求對接，瞭解傳媒翻譯市場的最新發展。在解決傳媒領域知識教學之外，西浦在翻譯師資選擇上要求所有教師均需經過嚴格的博士學術訓練，具有國際期刊發文經驗，也具有所在專業的實戰經驗，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較好地滿足翻譯碩士課程對師資的要求。

對於課室等學習環境，與其他高校相同，西浦也建立了翻譯實驗室(主要是電腦輔助技術軟體)和口譯實驗室。同時得益於院系合作，

課程還可以使用影視傳媒學院的數位實驗室以及影視製作實驗室授課。另外，由於學校的所有信息及宣傳資料均以雙語展示，為傳媒翻譯學生提供了良好的雙語環境；學校的雙語環境引發的學校各部門、特別是學校宣傳部門和影視傳媒學院對媒體翻譯的需求，為大眾傳媒翻譯碩士學生提供大量的個人／團隊實踐機會，有利於學生在實踐中進一步將所學知識轉化為能力。

翻譯能力中，譯者的程式性知識（傳媒翻譯技能）與陳述性知識作為學生共同缺乏的、期望學習的知識是傳媒翻譯課程的教學重點，在課程設置中需要予以側重。其中，陳述性知識，即對傳媒翻譯中涉及的社會因素的瞭解，可以通過統一授課形式，也可以分別在翻譯技巧講授以及翻譯工作坊中予以加入。

## 4.2 傳媒翻譯碩士課程課程設置

綜合上述因素，西浦傳媒翻譯碩士課程設立了以培養傳媒翻譯技能為核心，語言及傳媒知識為輔的一系列課程。課程主要分三大塊，即核心必修課、選修課、以及輔助性的“附加學習活動”。其中必修課重在培養學生翻譯理論和技能，選修課增加部分語言能力和傳媒專業課程，而“附加學習活動”是學校碩士課程體系的一部分，其設置旨在輔助學生學位課程的學習。作為額外學習活動，它歷時一年半，合計600小時，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修課、參加實習，聽講座或參加競賽。活動所涉課程不計學分，成績分為“及格”和“不及格”。

傳媒翻譯技能是翻譯培訓的核心，因此，傳媒翻譯碩士課程課程將重點放在培養陳述性和程式性知識的翻譯技能課程上。課程設置的13門課程中，6門核心課程和4門選修課都是用來培訓陳述性和程式性知識的。這些課程包括4門理論課程、5門傳媒翻譯實踐課和1門翻

譯技術課。在翻譯實踐課程中，所有課程均以講座和工作坊實訓為主要教學模式，目的是讓學生通過翻譯實踐掌握翻譯策略和翻譯中用到的技術輔助工具，熟悉翻譯過程涉及的各社會因素與翻譯之間的互動關係（陳述性知識），從而學會根據特定因素選擇並使用策略，鍛煉遇到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程式性知識）；翻譯技術課程幫助學生掌握必要的翻譯技術，培養學生利用翻譯軟體進行翻譯/翻譯課程管理的能力（程式性知識）；而作為培養專業譯員不可或缺的一環（Baker 1996: 42），課程的理論課程包含“翻譯理論”及“當代傳媒理論”，旨在幫助學生學習從傳媒翻譯的兩個側面分析理解傳媒翻譯現象，加深學生對傳媒翻譯過程中涉及的語言及社會文化因素的認識。與傳統翻譯理論課不同的是，針對傳媒翻譯，翻譯理論課程特別融入傳媒翻譯相關的批評性話語分析、多模態分析等理論，以實踐激發學生對翻譯的思考，經過理論學習之後，再指導學生用於實踐：“研究方法論”課程和“論文”寫作，強調以不同媒介出現的翻譯現象為對象展開研究，旨在進一步提高學生對傳媒翻譯現象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為未來希望從事傳媒翻譯研究的碩士生打下必要的基礎。

翻譯碩士培養中，作為核心翻譯能力培養的重要補充，語言能力以及主題專業知識課程是很多MTI高校忽略的一環，考慮到其對翻譯品質的影響，傳媒翻譯碩士課程根據學習者狀況予以不同考慮。學習者語言能力方面，傳媒翻譯學生的語言“讀”和“說”的能力相對較高，但相對而言寫作方面較弱，而這對翻譯有很大影響。為夯實學生英語寫作能力，西浦設置了貫穿兩個學期的語言課程，置於“附加學習活動”中。鑒於篇章知識是翻譯培訓中語言教學的重點（Kelly 2005: 73），選修課程“話語分析”旨在明譯者從不同語言層面入手，深入理解原文，並構架譯文。

在傳媒專業知識課程方面，一方面是傳媒知識對傳媒翻譯技能培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學生參差不齊的傳媒專業知識和繁重的課業壓力，如何解決，才能補足並平衡學習者的知識儲備？針對此，項目決定利用“選修課”和“附加學習活動”，加大課程選修的靈活性，鼓勵學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修。具體做法是：1) 將大部分學生沒有涉足過的知識(即有關傳媒工作環境、文化及有關社會環境的知識)設置為選修課，而將有的學生學過、有的學生未學的課程置於“附加學習活動”中。選修課程之一有關傳媒翻譯大環境——“世界傳媒文化”，這也是傳媒專業碩士生的課程。完成此課程的學習後，學生可以通過主題文化在不同國家媒體的呈現形式瞭解各國媒體文化、以及媒體與社會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既幫助學生理解傳媒文本，瞭解媒體運作方式，也對其翻譯策略的選擇有直接輔助作用；課程之二聚焦中國與傳媒的關係——“西方媒體眼中的中國”，這是結合國家關於中國文化傳播的政策考慮設置的課程。課程解析國際大社會(主要是英語世界國家)視野下中國形象的輸出和塑造，幫助學生從社會歷史文化角度，梳理中國國家形象在國際世界的變化。通過此課程的學習，希望學生瞭解傳媒翻譯與國家政策等社會因素的互動關係；2) 將更多關於主題專業知識的課程設在“附加學習活動”中：在考察了影視傳媒學院的本科與研究生課程後，項目認為學生應主要瞭解媒體基本運作以及傳媒文本的基本寫作技巧，因而選擇將傳媒本科課程融合進“附加學習活動”中，包括新聞寫作與報導、影視劇本創作、跨媒體改編、媒體管理等等。其中，課程會重點向學生推薦各類媒體文本的寫作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提高雙語傳媒文本的寫作能力，為後期或同期翻譯技能課程的學習打基礎。將課程設置在“附加學習活動”中，是基於它的靈活性和抗壓性，以期達到兩方面的目的：其

一可以將課程對學生的壓力減到最小。依據課程需要，課程將課程的評估形式設置為學生提交關於所學課程對傳媒翻譯作用的報告；而活動中的課程成績，只有及格 / 不及格之分，不計入學分；其二給予學生充分自主權。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對不同媒體的瞭解、以及個人興趣進行選擇。來自傳媒專業的學生，可以選擇講座、翻譯競賽、實習、或教研項目等等。

## 五、結語

Margheria (2005: 22) 認為“專業譯員主要在某一/兩個專門領域工作的想法很快就沒有市場了”，因為翻譯需求的種類和數量在急劇增加。毋庸諱言，“多能”式培養在一段時間內適應了某一專業翻譯量小、翻譯材料多樣化的工作性質，但對於漸趨成熟、不斷細化的市場，上述理念似乎已經到了需要修正的時候。要與急速增加的專門領域翻譯市場需求相對接，本文認為，培養專門領域譯員亦將成為未來翻譯教育的發展趨勢之一。文章從市場需求出發，論證了建立“專業領域翻譯培訓課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並從培訓機構、學習者、翻譯教師三方面，結合西交利物浦大學的傳媒翻譯碩士課程，做需求和環境分析，在此基礎上說明如何設置課程，以期達到既培養社會需要的專門領域譯員的目的，同時課程也為未來學生的研究道路打下必要的基礎。值得一提的是，課程體系中對於主題專業知識課程的設置方式，其中的“附加學習活動”，作為輔助性學習手段，其本身的靈活性和抗壓性，讓它在明學生學習主題專業知識方面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限於篇幅，關於課程設置中涉及的教學及評估模式等將另文撰述。

## 注釋

- [1] Kearns的研究主要針對課程重構，其中的採用 (adoption) 因素探究與已有課程相比，重新架構課程的好處，以及重構課程與教育環境的適配性等各種因素，不在本文考察範圍之內，故未列其內。

## 參考文獻

- Anderman, Gunilla & Margaret Rogers (2000). "Translator Training between Academia and Professio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Ed. Christina Schäffne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63-73.
- Baker, Mona (1996). "Professing Translation". *ESSE*, (1):42-44.
- Defeng Li (2001). "Translator Training in Hong Kong: What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can Tell Us". In *Transl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 Sin-wai Cha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85-95.
- Gile, Daniel (2009).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revised vers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Kearns, John (2006). *Curriculum Renewal in Translator Training: Curriculum Renewal in Translator Environments with Reference to Needs and Situation Analysis and Skills Transferability from the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of Polish Translator Training Cultur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Dublin City University.
- Kelly, Dorothy (2005). *A Handbook for Translator Trainers: A Guide to Reflective Practice*. Manchester, St Jerome.
- Kiraly, Donald C (1995).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Nord, Christiane (2005). "Training Functional Translators". In *Train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Pedagogies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d. M. Tennyn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9-224.
- Sharkas, Hala (2013).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Subject Knowledge in the Teaching of Scientific Translation".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7(1): 51-70.
- Ulrych, Margherita (2005). "Training Translators: Programmes, Curricula, Practices", In *Train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Ed. Martha Tennynt.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33.

- 顧曹進、靳琰 (2016),〈市場驅動下的翻譯碩士培養模式——以西北師範大學為例〉,《中國翻譯》2: 50-55。
- 崔啟亮、劉佳鑫 (2016),〈國有企業語言服務需求調查分析及啟示〉,《中國翻譯》4: 70-76。
- 崔啟亮 (2017),《全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與就業調查報告》,北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 黃友義 (2010),〈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的發展趨勢與要求〉,《中國翻譯》1: 49-50。
- 李德鳳 (2012),《翻譯教學: 需求分析與課程設置》,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劉和平 (2017),〈譯者, 須不忘初心、追逐興趣〉,《法語人》, (<https://fr.hujiang.com/new/p1194824/>) (流覽日期: 2017年11月)。
- 平洪 (2016),〈對我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育發展的反思〉,《中國翻譯》5: 45-53。
- 曲衛國 (2016),〈國家標準能讓英語學科走出困境嗎?——談談英語專業改革與英語學科建設的關係〉,《外國語》39(3): 11-13。
- 束定芳 (2016),〈英語專業改革與發展的再思考〉,《東北師大學報》3: 115-117。
- 文軍、穆雷 (2009),〈翻譯碩士(MTI)課程設置研究〉,《外語教學》4: 92-95。
- 趙軍峰、穆雷 (2013),〈MTI教學的創新與實踐: 以廣外高翻學院為例〉,《外文研究》2: 78-85。

## 作者簡介

王惠, 女, 博士, 西交利物浦大學講師, 利物浦大學博士生導師。研究興趣: 翻譯教學、傳媒翻譯。通訊郵箱: [hui.wang@xjtlu.edu.cn](mailto:hui.wang@xjtlu.edu.cn)

阮周林, 西交利物浦大學英語系主任、教授, 利物浦大學博士生導師。研究興趣: 應用語言學、語篇分析與學術英語。通訊郵箱: [zhoulin.ruan@xjtlu.edu.cn](mailto:zhoulin.ruan@xjtlu.edu.cn)



# 中國翻譯起源於巫覡： 與神靈溝通\*

邵有學

## **Abstract**

*After considering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redefines and broadens the concept b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Wuxi (also known as shamans) in prehistoric China in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origi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Wuxi were the origin of many classical works and disciplines in China, such as I-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literature, arts, music, drama, medicine, etc.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lated to Wuxi,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uxi are the original sourc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rough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piritual world.*

## 一、引言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記載並傳承下來的古文明。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是以神話開始，如古希臘、古印度、古巴比倫。中國自古就稱為神州。那麼，翻譯活動或翻譯現象是否伴隨著人類的誕生或在人類誕生前就有了？翻譯源頭在哪？翻譯起源的研究，應該要與人類起源以及語言起源，人類的交際活動等密切聯繫起來，人類文化文明與翻譯活動密不可分。

李亞舒、黎難秋認為中國的翻譯歷史，“如果追溯到華夏人與不同地域和民族剛剛開始相互交流的歷史，……這種‘釋義’性的翻譯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甚至更早。在各民族之間，語言和文字出現，就應該出現了翻譯”（2000: 4）。謝思田從“沒有文字記載的譯史發端”、“具有粗略文字記載的譯史發端”和“具有相對確切文字記載的譯史發端”三方面對我國譯史發端做出界分（2011: 78-82）。許鈞得出“中西翻譯活動的存在前期時間基本吻合：至今已約有四千多年的歷史”。謝思田認為許鈞教授之界定是著眼於“語際翻譯”（不同民族語言或方言之間的口譯），而不是廣義翻譯（2011: 79-80）。

本文從翻譯的廣義概念出發，以史實史料為依據，提出中國翻譯活動起源於上古時期<sup>11</sup>與神靈溝通的巫覡。

## 二、翻譯的廣義定義及重新界定

穆雷、鄒兵指出：自人類有翻譯活動以來，對“翻譯”定義沒有大的改變。古今中外雖對翻譯有不同的名稱表述，如中國古代曾以“寄”、“象”、“狄鞮”、“譯”、“舌人”等來指稱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外國多用“繪畫”、“橋樑”、“叛逆者”等來比喻翻譯活動或譯者身份，但其內涵大體一致。工具書如《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牛津英語學習詞典》，*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Gambier, et al., 2010）等對“翻譯”定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階段人們對於翻譯活動或翻譯行為的普遍認識。“翻譯”的定義雖然加入了語言學、社會學、認知科學等多學科視角，但關注點仍聚焦在把信息“從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上。（穆雷、鄒兵，2015: 18）這都是狹義的翻譯界定。

美國形式主義語言學家雅各森（R. Jakobson）把翻譯分為三大類：

語內翻譯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語符翻譯或符際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Jakobson 1959: 232-239; 2000: 113-118; 郭建中, 2000: 86)。筆者認為這個定義也在“三維世界”範疇內。

除了雅各森對翻譯三個層面理論描述和界定外，王寧認為翻譯定義“還應該加上跨文化翻譯”，“**翻譯學所面對的應該是所有的翻譯活動以及所有的翻譯現象**（黑體為筆者所加，下同），包括語言文字翻譯，密碼翻譯，符號翻譯以及聲音和圖像翻譯。它的功能很像符號學，是一門跨越語言、文化、藝術門類以及學科之界限的綜合研究。”（2014: 2-3）。因此，王寧從以下七個方面重新定義翻譯，包括：作為一種同一語言內從古代形式向現代形式的轉換；作為一種跨越語言界限的兩種文字文本的轉換；作為一種由符碼到文字的破譯和解釋；作為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圖像闡釋；作為一種跨越語言界限的形象與語言的轉換；作為一種由閱讀的文字文本到演出的影視戲劇腳本的改編和再創作；作為一種以語言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闡釋（2015: 12）。顯然，王寧的定義更加廣闊。

謝思田（2011: 79）認為：

雅各森分類打破了傳統的‘語際翻譯’概念，將‘語內翻譯’（同一語內交流）和‘符際翻譯’（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以及非語言符號之間轉換信息的活動）統統納入翻譯世界，從而擴大了翻譯的時空：……歸根結底言，翻譯不再限於人類的語際交流，而是一切生命的基本運行方式——**一切同類生命體乃至異類生命體之間**的交流都屬於翻譯範疇。……在這個角度上，若僅就人類翻譯而言，我們可從理論上將我國悠久譯史大限度推想至約170萬年前，即從最早的元謀人誕生之時起，甚至在其‘口語’還未出現之境況下，‘符際翻譯’就已在中土開始了——中國翻譯文明史可與中國人類文明史一樣古老、一樣源遠流長。

在中國翻譯界，辜正坤最早將人類最基本的溝通行為定義為廣義翻譯。他提出：翻譯是一種信息轉換行為。信息轉換行為作為一種翻譯現象實際上貫穿於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人類的基本溝通行為之一。翻譯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之一。人自身就是一部翻譯機器，人的生生活動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翻譯行為構成的（1999：1-2；2000：23-24）。<sup>[2]</sup>

基於上述定義，我們重新界定翻譯如下：翻譯可以是對跨語言，跨時間，跨空間，跨生命維度，跨文化的——對有圖像和（或）有文字和（或）有聲音的交流信息進行闡釋的轉換活動形式。如此，這個廣義的翻譯概念，就不同於以前三維世界的狹義翻譯範疇，而是上升到多維乃至全維高度，而這一切是基於對巫覡的研究。

### 三、國內外巫覡研究簡介

巫覡與人類的文明起源密切相關。巫覡應是最早宗教的前身，以施行巫術而得名，為上古時期的氏族長、部落首領。本文所謂的巫或巫覡，是一種身份、一個群體，即巫術的表演者、執行者和傳承者。巫術與巫覡的歷史源遠流長，但現在不能確定其產生的具體年代。大多數學者同意巫術的產生早於巫覡的說法。從考古資料和各種文獻記載看，至少至殷商時代已有巫覡的存在（文鏞盛1999：6）雖然目前沒有統一說法，筆者傾向於巫術和巫覡是在人類誕生時就有的觀點，不然無法解釋巫術和巫覡的神秘性。

據考古學成果，巫覡最遲於母系氏族社會半坡仰韶文化遺址的彩盆上已有顯露。<sup>[3]</sup>另從半山文化時期的彩陶盆人形畫像，<sup>[4]</sup>以及大汶口文化時期獠牙鉤形器、陶缸等隨葬品<sup>[5]</sup>可推斷巫覡在原始時代就已產生了。此外，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也同樣認

為：巫術從來沒有“起源”一說，從來不是發明的、偽造的。簡言之，一切巫術都是古已有之的“存在”(1986: 57-58)。據此推斷，巫覡應該是在人類誕生時就產生了。

據李娟綜述，有關巫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開始，國內許多學者從不同側面對巫的產生、內涵等作了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論著有瞿兌之的《釋巫》，側重於歷史文獻考察；陳夢家的《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重在甲骨文考證；宋兆麟的《巫與巫術》，側重民族學研究；張光直的《中國青銅時代》，側重考古學研究；李安宅的《巫術的分析》，側重社會學研究。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如日本學者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學論》、加藤常賢的《巫祝考》，韓國學者文鏞盛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巫覡》等。到目前為止，巫的研究已涉及到政治、文化、風俗、宗教等多個方面，且研究領域還在不斷擴展，並深入到經濟這一基礎層面(李娟2008: 379)。而最具影響力的是兩位英國學者，其一是人類學家詹姆斯·弗雷澤(James Frazer)的《金枝》，其二為馬林諾夫斯基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

臺灣學者林富士綜觀最近20多年的研究，發現學者主要關注以下三個方面：巫者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統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地位尊崇，擁有極大的威權和影響力，以陳夢家、張光直為代表)；巫者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學、藝術、音樂、戲劇、醫學等技術起源於巫或與巫覡有密切關係，以白川靜、周策縱、吳全蘭等為代表)；巫覡的神靈世界和宗教儀式(圖像和器物材料為依據，以林巳奈夫、楊淑榮、吳榮曾、李零等人為代表)(2010: 70-72)。

限於篇幅，有關巫覡研究綜述詳見〈中國傳統巫者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歷史學界為核心〉(曾雙秀2013: 23-37)。我國上古文字、易

經、天文曆算、歷史、宗教、醫學、戲劇等等好多起源於巫覡及巫術。翻譯起源於巫覡這個觀點，由筆者首次提出。“巫覡具有上述民意、下傳神旨的社會功能”（宋兆麟2001: 80），也即翻譯的功能。巫覡是人界和神界之間的媒介，神旨須由巫覡的傳譯才能通達凡人。巫覡是溝通人、神之間最高級別的也是最初的翻譯工作者。

#### 四、巫覡與天地神靈的溝通

##### A、早期記載巫覡的史料

古時男巫女巫均可謂之巫，或統稱為巫覡。<sup>[6]</sup>雖然在中國有關巫覡的具體形象在仰紹文化中已有發現，而現在能夠確認最早期的實物資料，則是甲骨文上的證據。我們通過對甲骨文的探索，至少能確認殷商時期巫覡的存在和發展情況（文鏞盛1999: 10-13）。

“巫”為象形字。據甲骨文，“巫字”像古代女巫所用的道具。“巫”，上一橫頂天，為陽；下一橫立地，為陰；中間一豎直通天地，其左右有二“人”，左為陽右為陰，表示陽中之人能與陰中之人相互溝通，忽而是陽忽而是陰，同時在陰陽界來去自如。故“巫”是溝通人神、隨時進出陰陽的人。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巫》曰：“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袂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sup>[7]</sup>“巫也者，處乎人神之間，而求以人之道，通於神明者也。”<sup>[8]</sup>

早期巫覡就是部落或氏族集團的首腦，“溝通人與神之間，為人們祈福免災”。傳說中的五帝就具有大巫身份。《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帝顓頊高陽則“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

祀”，帝嚳高辛“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帝舜“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群神”。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鯨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躡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sup>91</sup>

這一段話常被學者引用，是現存史料中最早關於巫覡的詳細記載。觀射父對楚昭王（西元前515—489年在位）說的這段話體現了巫覡具有翻譯的功能和職責。最初通過普通的巫即可實現人與神的直接交流。顓頊時代施行“絕地天通”，斷絕一般巫覡與天地神靈溝通的權力，而改由一人或極少數統治者專享獨有，天地神靈與人之間的溝通必須通過巫覡翻譯才能進行。

蔡先金、林富士等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原始巫術經歷了三個階段：民神不雜、民神異業（神事由巫覡及祝、宗、卜、史專門負責）；民神雜糅、家為巫史（人人參與，巫覡不能主導）；絕地天通、無相侵瀆（巫覡主管，統治者壟斷）。（蔡先金、趙海麗2005: 65；林富士2010: 71）。

## B、巫覡具備翻譯功能

巫覡是人界和神界的交通、媒介者，尤其在“民神不雜”時代，巫覡更是溝通這兩個世界之翻譯。人們只有通過巫覡才能瞭解神意，

從而獲得神助。所以，與神靈溝通交流——翻譯的功能，是巫覡最基本能力之一。

在上古時代，巫覡不管是“宗、祝、蔔、筮”等專門官吏，還是民巫，憑藉他們亦人亦神的特殊身份，能與神靈進行溝通，上傳民意，下達神旨，趨吉避凶，除災去病，從事預言、占卜、祭祀和招魂等巫術活動，作為人與神靈的橋樑、媒介。事實上，巫覡就是我國最早的翻譯。巫覡能定向捕捉接收到超高級生命——神靈的旨意，通過巫覡理解準確無誤地翻譯傳達給人類，進行人天、人鬼、人神之間的溝通、傳譯活動。這種翻譯形式也是迄今為止最高級的翻譯，說最高級是因為巫覡能與各種生命、尤其是超高級生命溝通交流——翻譯。因此，我們可認定巫覡為我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批知識人、翻譯和思想者。而無文字記載前，巫覡就一直能與神靈溝通，更能說明其是最早翻譯了。

是否具有與神靈交流能力是巫覡和一般人最明顯區別。根據巫覡的功能，可分成直接與神靈交通的巫覡，和通過某種形式才能與鬼神交通的巫覡兩種。巫覡可請神附體，或靈魂出竅進入神靈世界。根據筆者對現今具有巫覡特徵人士多年追蹤考察，他們通神靈情況各異，有的在通神時，能聽到神的聲音，有的看見圖像，有的看見文字，有的兼有這三種情況，有的甚至是一種感知感覺而已。這估計與這些巫覡的技能類型和層次有關。

無獨有偶，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蘇格拉底同樣提到了與巫覡相同的愛若斯具有“翻譯”的作用：

把人們的祈求和獻祭 (τὰδε' σεικαίθυσία) 傳譯和轉達 (ε' ρμηνευ' ουκαίδιαπορθμευ' ον) 給神們，把神們的旨令和對獻祭的酬報 (ε' ρμηνευ' ουκαίδιαπορθμευ' ον) 傳譯和轉達給人們；居於兩者之間，精靈正好填充間隔，於是，整體自身自己 (τὸπναυ' τὸαυ' τὸαυ' τψ) 就



連成一氣了。這樣一來，精靈也就感發了所有涉及獻祭祭儀識語和種種算卦施法的占卜術和司祭術。本來，神不和人紮堆，靠了神靈的這些能力，人和神才有來往和交談，無論在醒的時候還是沉睡中凡通曉這類事情的，都是些古靈精怪的人(δαίμων' ρ)，至於只精通其他技藝或手工活的，都不過是些低俗的人(βναυσο)。這類精靈有不少，而且多種多樣，愛若斯不過其中之一(柏拉圖 2003: 74-76)。

這裡講的是愛若斯(Eros，可意譯為愛)居於神人之間，上情下達，起著橋樑的作用(蔡新樂 2014: 105)。

可見“愛若斯”、“古靈精怪的人”、“精靈”其實就類似巫覡，他們做著雙方的“傳譯和轉達”，也就是翻譯。巫覡翻譯的說法與西方闡釋學翻譯的提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論巫覡之身份和地位，還是作用、職權如何變化，巫覡的基本工作——與神靈溝通、傳譯一直沒變。巫覡是溝通人、神兩個世界的翻譯工作者。

## 五、巫覡漸變為三維的翻譯

巫覡溝通人神之間，在上古文明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他們是政治統治集團的首領，亦是古代文化的創造者、保存者與傳承者。但隨著歷史的演進，巫覡的地位逐漸產生變化。

巫覡具有溝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可以同神秘世界對話，於是既是人天、人鬼、人神之間溝通的管道，又是阻隔的屏障，人們需要通過他們與天，與神靈，與祖先交流。葛兆光認為：“**這種最基本的翻譯形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顯得非常重要。他們能以祭祀等儀式，將人的意志傳達給鬼神，也能以書寫(如解注瓶上的符)、詛咒(如祝

由)等等將神鬼的力量傳達到人。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宇宙包括了神祇所在仙島神山或天上世界,人類所在的世間,以及‘土主’、‘地下主’及‘泰山’所管轄的下界,<sup>[10]</sup>而居於這三個世界之間可以上通下達的,只有巫覡一流人物,儘管在漢代他們漸漸失去了相當的地盤,也漸漸退出了大傳統的許多知識領地,但其影響在民間依然是有決定性的力量”(2001: 228-229)。巫覡職能地位等開始變化了。

巫覡的政治地位在殷商時期達到鼎盛,殷商後期漸漸走下坡路,西周以後有更顯著下降。到春秋戰國時期,巫覡不再是統治組織的領袖,也不再是朝廷的重臣,巫覡的社會地位受到各種思想流派的激烈衝擊,而逐漸為祝、宗、史等所代替。巫覡漸漸脫離一般官僚地位,或進入專職的巫官,或成為士大夫和平民家庭的家臣。於是巫覡活動舞臺漸次轉移到民間,其作用和權能發生了比從前更顯著的分化。由於這是一個複雜的漸變過程,故而對於巫覡的概念和定義的問題導致今世諸位學者的混亂(文鏞盛 1999: 24-30)。巫覡漸漸被邊緣化。

巫覡除了是最早的翻譯、思想者等外,還是人類最早的專門職業,即男巫和女巫,從此也使得宗教專門化、制度化和規範化。後來佛教、道教等宗教成立,佛教、道教與巫術則混合在一起,互相影響。佛教、道教裡存有巫術,巫術裡存有佛、道的因素。道士其實是巫覡、方士的轉型,而道士所擁有的風角、堪輿、遁甲、胎息、巫蠱等道術都是從巫術和方術流傳下來的。這些術法就構成道教信仰的基礎(ibid: 195)。佛教、道教與巫術實乃一脈相承。

實際上,僧侶和傳教士是真正拉開世界翻譯史序幕的人,而不是“象胥”“舌人”。隨著社會的變化,分工的細化,三維世界的翻譯逐漸形成。

## 六、結語

現代人大多認為巫覡和巫術是封建迷信，其實巫覡和巫術與人類的文明起源關係非常密切。原始社會巫術和巫覡，出於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在當時成為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屬於當時人類精神活動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也是當時社會活動中最普遍現象，而這種主流文化、主流思想在翻譯（思想）史中卻從未提及。

本文從梳理翻譯的定義入手，從全維高度重新界定翻譯，從追溯巫覡是諸多學科和技術之源頭及史料分析中得知，巫覡其實是翻譯的起源。中國自古就稱為神州，神州大地上神傳文化就不足為奇。上古時期的文化，就是巫覡文化；上古時期的思想就是巫覡思想。諸多史料已經證實：上古時期人人都相信神和巫覡。至於巫覡是如何與天地神靈用語言和思維溝通的，將另撰文分析。

## 注釋

- [1] 上古時期：即上古時代，指文字記載出現以前的歷史時代。世界各地對上古時代的定義也因此不同。在中國上古時代一般指夏以前的時代。在兩河流域和埃及，一般指西元前5000年以前的歷史時代。因為上古時代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那個時候發生的事件或人物一般無法直接考證。這些事件和人物也往往帶有神話色彩。史學界定義：夏朝建立之前的歷史時期，統稱為“上古時期”。或稱為“上古時代”、“遠古時代”、“三皇五帝時代”。上古文化就是巫覡文化。
- [2] 感謝辜正坤教授提供此觀點材料。
- [3] 參見張光直《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民族研究集刊》，1961年第9期。
- [4] 參見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廣河地巴坪半山類型墓地》，《考古學報》，1978年第9期，206頁。
- [5] 參見山東文化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105頁。
- [6] 本文巫覡包括了“巫、宗、祝、蔔、筮”等專門官吏，既含官巫也包民巫。根據文籍

盛、瞿兌之、陳夢家等的研究，巫現在各個朝代的觀念含義是不一樣的，為了方便敘述，本文使用通稱的“巫覡”。

[7] 參見許慎：《說文解字·巫》，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00頁。

[8] 參見瞿兌之：《釋巫》，《燕京學報》1930年第3期。

[9] 參見《國語·楚語下》，599—5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排印本，1988。

[10] 參見小南一郎《漢代的祖靈觀念》，東方學報六十六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4。

## 參考文獻

Jakobson, Roman (1959/2000).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On Translation*. Ed. R. A. Brow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32-239./Reprinted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13-118.

蔡先金、趙海麗(2005)，〈論顛頂時代巫教之變革〉，《濟南大學學報》4: 65。

蔡新樂(2014)，〈翻譯哲學真的沒用嗎？——從皮姆的《哲學與翻譯》看翻譯的觀念化及西方翻譯思想史的重構〉，《外語教學》6: 105。

馬林諾夫斯基(1986)，《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上編)，李安宅譯，上海：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57-58。

葛兆光(2001)，《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28-229。

郭建中(2000)，《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86。

辜正坤(1999/2000)，〈論翻譯與翻譯學新定義——《譯學大詞典》序〉，孫迎春主編《譯學大詞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2。/《中國翻譯》，2: 23-24。

李娟(2008)，〈略論先秦、秦漢時期經濟對巫的影響〉，《秦漢研究》，00: 379。

李亞舒、黎難秋(2000)，《中國科學翻譯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4。

林富士(2010)，〈中國古代巫覡的社會形象與社會地位〉，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70-72。

穆雷、鄒兵(2015)，〈翻譯的定義及理論研究：現狀、問題與思考〉，《中國翻譯》，3: 18。

宋兆麟(2001)，〈中國史前考古發現的薩滿遺跡〉，《黑龍江民族叢刊》，1: 80。

王寧(2014)，〈走出“語言中心主義”囚籠的翻譯學〉，《外國語》，4: 2-3。

- (2015),〈重新界定翻譯：跨學科和視覺文化的視角〉,《中國翻譯》, 3: 12。
- 文鏞盛(1999),《中國古代社會的巫覡》,北京：華文出版社。
- 謝思田(2011),〈我國譯史發端界說——中國翻譯釋意思想起源的尋跡〉,《外國語》, 2。
- 曾雙秀(2013),〈中國傳統巫者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歷史學界為核心〉,《漢學研究通訊》, 1: 23-27。

**\*基金項目：**

本文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立項重點課題“中國翻譯思想史研究”(項目編號：11JJCW01Z)、以及教育部基金項目(12YJC74011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研究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邵有學，浙江傳媒學院國際文化傳播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人文學院榮譽研究員、訪問學者(2015-2016)。出版專著《中國翻譯思想史新論》(2018)，主要學術論文發表在《外國語》、《中國翻譯》、《中國外語》、《中國科技翻譯》、《外語與外語教學》等外語類核心期刊和國際期刊上。研究方向為翻譯學與跨文化交際。電子郵箱：shaoyouxue@163.com。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A Case Study of Mountains May Depart**

*Sun Xichen*

## ***Abstract***

*In the translation of dialect dialogues from Chinese films into English, it is often seen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non-standard features of the dialogues is a common practice, which inevitably results in the loss of the original dialecta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methods i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redundancy in the study of film as a multi-semiotic text, the paper proposes a dialect subtitl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nalyse what kinds of textual functions are lost due to the levelling effect,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non-verbal channels of the film can completely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and what translation solutions can be applied to better convey the information of Chinese dialect dialogues into English.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Mountains May Depart, a film featuring the Fenyang dialect and Shanghaiese, the paper categorizes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the English dialect subtitling into two groups: one shows information self-sufficiency within the multi-semiotic text, and the other embodies the need for compensation by using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s.*

## Introduction:

In China, films using dialects have begun to enter the mainstream film industry, especially after the great success in 2006 of *Crazy Stone*, a low-budget film with a mixture of Cantonese, Chongqing, Qingdao and Tangshan dialects. Jia Zhangke, a well-known director in China, constantly uses the Fenyang dialect of his home province Shanxi in his movies. His film *Still life* (2006), in which the Fenyang, Taiyuan and Chongqing dialects were used by the characters, won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s top award, the Golden Lion. His other movie *Mountains May Depart* (2015) in which the Fenyang dialect and Shanghainese were spoken, was domestically released and won the Audience Award and Best Film Award at the San Sebasti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Best Screenplay Award at the Asian Film Awards.

Some scholars identified two types of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linguistic varieties in subtitles, namely, neutralisation and preservation (Ramos Pinto 2017; 2009). Similarly, Tien (2015: 16) discovered three main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in *Pygmalion*, which are “divergent varieties”, “style shifting”, and “bilingualism/ multilingualism”. Meanwhile, Rittmayer (2009) proposed that non-standard spellings and grammar did not frequently occur in the subtitles of films because audience might have difficulty in reading them. When discussing subtitling the Sheffield dialect into Standard English, Hamaida (2007) found out a significant loss of emotional warmth, individuality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hich employed predominantly a standard written form. Moreover, in the *inTRAlinea* special issu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Dialects on Multimedia” published in 2009, 2011 and 2016 respectively, scholars addressed the dialect translation issu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volving “the technical, textual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ual factors behind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Ramos Pinto 2017: 1). Nonetheless, research into Chinese dialect subtitling (Chan 2018; Zheng 2011) has just begun and concentrated on Cantonese subtitling on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other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those mentioned in the Chinese films above.

It is often found that there is a levelling effect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dialectal subtitles in some popular Chinese films. Levelling effect here refers to the elimination of non-standard features of speech. But as Hatim & Mason noted, “rendering ST dialect by TL standard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losing the special effect intended in the ST” (2001: 41):

When films are subtitled, certain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mode have to be represented in writing. This mode shift can create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represent in writing the slurred speech of a drunkard. (Hatim & Mason 2001: 41)

Most of the dialects used in popular Chinese films, such as the Fenyang dialect in Jia Zhangke’s films, are mostly represented by their phonological and lexicogrammatical featur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represen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reception of Jia’s films, it seems that this levelling effect does not affect their international popularity. Why do his realistic films featuring a distinct Fenyang dialect succeed abroad, though the dialect spoken by the characters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subtitled into English?

In *Mountains May Depart*, the dialects used by the main characters change as they grow up. Accordingly, the plot is thus segmented into three sections, i.e. beginning in 1999, continuing in 2014 and ending in 2025. Inevitably, language plays an essential part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 development, as explained by Jia:

When little Dollar visits his mother in Shanxi after the divorce, he can only speak Mandarin and Shanghainese. In order to speak to her own son, Tao has to switch from her dialect to Mandarin. By 2025, he has completely forgotten how to speak Chinese (Ma 2016).

The gradual erasure of his local dialect suggests a disappeara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and individuality, and the scene in which he and his father, Zhang Jinsheng, have to use Google Translat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pushes the language contrast to a climax. However important the dialect uses



and shifts are, they have not been embodied in the film's English subtitles. Hypothetically, the film's success might be explain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dialects deployed is not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film's theme, plot and style or characters' acts. However, is that really the case?

## Theoretical Framework

### **Film as a Multi-semiotic Text: Can Non-verbal Information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Díaz-Cintas proposed that “films are texts of great semiotic complexity in which different sign systems cooperate to create a coherent story” (2014: 47). To him, “in film, light and sound create two fundamental systems of space, time, and causal interaction: one on the screen before our eyes, and another within a story world that we conceptualize in our heads” (2014: 47).

According to Stöckl's framework, the visual and auditory semiotic resources required to create and interpret audiovisual texts can be grounded under four core modes: sound, music, image and language (Péré-González 2014: 192).

Sound and music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auditory media, whereas image depends on visual media. However, language in Stöckl's framework is a more complicated mode due to its spoken form appearing in the aural channel and its written form emerging in the visual channel. Wang Zhimin (2007) explored film linguistics and maintained that film was a language per se. If film per se was regarded as a language, spoken language should be merely treated as one mode in the film. The medium of spoken language was sound, while “the medium of film language is the combination of sound and continuous images” (Wang 2007: 88). However, the written language has not always been highlighted as an indispensable constituent in the film language, or it is assumed that it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image language in Wang's film

language system owing to its same dependence on visual media. According to Yves Gambier (2012: 48), written form in audiovisual products encompassed “letters, headlines, menus, street names, intertitles, subtitles” and so forth, among which some were printed on the objects shot in the *mise-en-scène*, such as letters, street names and trademarks etc., and others arose from the film’s postproduction, such as headlines, menus, subtitles and cast list etc. Nevertheless, Wang’s framework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in addition to spoken language, there are varieties of montage language, long-take language and stream-of-consciousness language in films (Wang 2007: 88-134). These three “languages” are achieved by different shooting styles, which influence the film rhythms to some extent. Additionally, Ramos Pinto (2017: 7) proposed three categories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mise-en-scène*:

Costume and makeup (to account for the character’s appearance), figure behaviour (to account for the character’s actions) and setting (account for where the action is taking place).

Those three component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actual contents in each shot. Meanwhile, Péré-González (2014: 214-217) suggested that “colour, lighting and camera movement (e.g. panning, titling, cuts) are other productive visual sub-modes in multimodal artefacts” except for “visual sub-mode elements” such as “actors, objects or landscapes”. Here visual sub-mode elements constitute the *mise-en-scène*—the contents, while colour, lighting and camera movement correspond to shooting styles—th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film text more specifically, Delabastita (1989: 199) distinguished four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verbal signs of visual presentation (such as credit titles and written documents appearing on the screen), non-verbal signs of visual presentation (covering the film’s photography), verbal signs of acoustic presentation (including songs and the dialogue), and non-verbal signs of acoustic presentation (mainly referring to music and other background sound). Similarly, Gottlieb addressed four semiotic channel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Verbal audio: the dialogue and its paraverbal elements, non-verbal audio: (background)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verbal visual: displays and captions, and non-verbal visual: composition and montage (Pedersen 2015: 168).

On the basis of it, Gottlieb (2000: 20) proposed his concept of intersemiotic redundancy, “which in a nutshell says that the other semiotic channels compensate for information loss stemming from condensation of the verbal audio channel” (Pedersen 2015: 168). In addition, Marleau (1982: 274) used the term “redundancy function” (*fonction de redondance*)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that “words and images communicate more or less the same information” (Díaz Cintas 2014: 52). Furthermore, Pedersen used the term “polysemiotics” (2007: 163-164) to refer to a much broader scope which indicated that semiotic channels could not only copy the information present in the other channels and thus created redundancy, but were also pulled into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cause semiotic tension (2015: 168).

In this research, the dialect dialogue and the subtitles in the verbal visual channel are the primary objects of study. Some non-verbal factors might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explanation.

In subtitling, the activities of reading, hearing and seeing into one single activity, as if they were all the same. What you read is what you hear, and what you hear is more often than not, what you see (Trinh 1992: 102).

From these perspectives, the information loss in dialect translation into Standard English can be compensated for by other semiotic channels, i.e. non-verbal audio and non-verbal visual channels. Non-verbal audio channel implies background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while non-verbal visual channel represents the character’s appearance and actions as well as the action’s setting through montage language, long-take language and steam-of-consciousness language. Those four semiotic channels constitute the multi-semiotic text of a film in this research.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loss of dialectal features, can that information redundancy attain information

self-sufficiency within the film as a multi-semiotic text in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verbal audio channel to the verbal visual channel? Or can the missed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ubtitling dialect into standard language be totally compensated for by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in the non-verbal channels within the film? If the loss is not completely made up for by other semiotic channels,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s should be applied so as to solve this translation problem.

### **Translation Solutions and Information Loss**

Ramos Pinto (2017: 7) claimed that the most frequently identified strategy was centralisation (i.e., translation preserved variations but showed a lower presence of non-standard discourse in the target product), which “was presented by Toury as 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sation’”. Based on her research into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literary texts from English into Portuguese, Ramos Pinto also proposed more subtit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ncompassing “addition of written indications after direct discourse moments indicating that the character was speaking in a non-standard variety”, “reduction of the linguistic variation to forms of address and honorifics”, “upgrading of the level of formality of the standard discourse”, “use of oral discourse features” (2009: 293) and so forth. In this paper, the solutions tend to focu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nformation loss, which might be similar to the strategies identified by Ramos Pinto (2009: 293), but with a clearer translation aim, i.e.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formation loss.

In order to find an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olution to make up for the loss,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clarify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has been lost in the process of dialect subtitl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be applied for this purpose is derived from the user-related linguistic vari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Hatim & Mason 2001: 41) in discourse analysis, as shown in Table 1. A segment of a dialectal speech can convey several layers of meaning: (1) for geographical dialect, it implies the origin of the user; (2) for temporal dialect, it reflects change through time; (3) for social dialect, it responds to social stratification within a speech community; (4) for stand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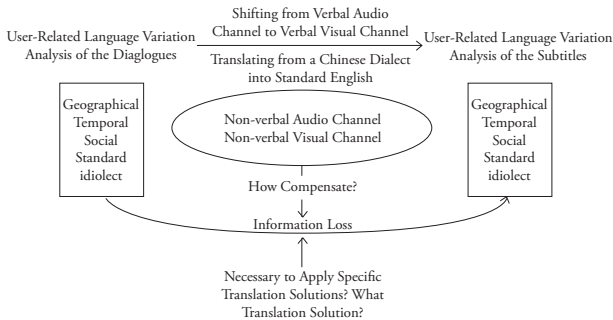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dialect, it defin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dialect; and (5) for idiolect, it “illustrates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is the individuality of a text user” (Hatim & Mason 2001: 43), all of which help to develop the characterization process and propel the plot.

User: Dialects
Geographical
Temporal
Social
Standard
Idiolect

**Table 1** A User-related Linguistic Vari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A dialect subtitl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s based on discourse is also proposed below to demonstrate each step involved in the analysis of dialect dialogues. Firstly, a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temporal, social, standard and idiolect dimensions of the dialect used in the film is conducted; secondly, an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translated English subtitles for that excerpt is carried out by referring to the same analytical factors; thirdly,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loss in the process of dialect translation is implemented; fourthly, an attempt at using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non-verbal audio and visual channels to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is made. If that attempt fails, a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 will be applied for compensation effect.



**Figure 1** A Dialect Subtitl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 ***Mountains May Depart: A Case Study***

This case study trie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loss caused by the levelling effect can be completely compensated for within the multi-semiotic text of the film, and what types of translation solutions can be suggested for the loss if the film's multi-semiotic text cannot achieve its information self-sufficiency through its information redundancy. The story of *Mountains May Depart* revolves around three main characters, Shen Tao, Zhang Jinsheng and Zhang Daole, aka Dollar, whose uses of dialects are crucial to their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plot development. .

### **Dialect Subtitling Examples and Information Self-sufficiency**

#### *On an Excerpt of Dialogue between Tao and Dollar*

When meeting her son, Dollar, for her father's funeral after her divorce from Zhang Jinsheng, Tao initially speaks the Fenyang dialect to ask her son to call her Mama in the Fenyang dialect, but Dollar replies "Mummy" in Mandarin, which annoys her. The English subtitles are shown as below, without any original dialectal features. An analysis of this dialogue excerpt based on the above dialect subtitl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reveals the following facts: o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hometown where Dollar is truly from;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the social class identification that Tao wishes his son to accept, and like her as a middle-class mother from a small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But when her son replies to her in Mandarin, her desire is frustrated unexpectedly and intensely. Meanwhile, on the temporal and idiolect dimensions, there is no valuable information shown.

Dialogue	Subtitles
Tao: 到樂 怎麼不跟媽媽說話呢 叫媽 (in the Fenyang dialect)	Tao: Daole... Why don't you talk to your Mama? Call me Ma.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Dollar: 媽咪 (in Mandarin)	Dollar: Mummy.
Tao: 媽咪 某人教你這麼叫的 爽快點兒 叫媽 (in the Fenyang dialect)	Tao: Mummy? ho taught you that? Be grown-up! Say “Ma”.
Dollar: 媽 (in the Fenyang dialect)	Dollar: Ma.

**Table 2** Dialogues and Subtitles between Tao and Dollar

The subtitles in Standard English just use two oral expressions, Ma and Mama,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Mandarin Mummy as well as to embody Tao’s complex emotion behind her dialect usage. Those oral expressions, which cannot provide the same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the geographical or social dimension of the dialect dialogue, can merely indicate Tao’s desire for intimacy with her son. Nevertheless, the loss can be made up for by the image in the film via figure behaviour and long-take language. Through the approximately 1 minute 20 seconds long-take, the dialogue and the pictures are enclosed into one complete sentence in the film language.<sup>[1]</sup> Tao’s desire and frustration are well represented by her actions: grabbing Dollar’s fashionable scarf and putting on the black armban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xiao* (孝) printed on it.<sup>[2]</sup> O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he fashionable scarf implies Shanghai, where his step-mother lives; while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it implies elite class. Here the character *xiao* symbolizes local identity and tradition. Additionally, her angry facial expression and abrupt body movements intensify her anxious desire for her son’s identification on both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n the standard dimension, Tao’s Fenyang dialect is relatively standard throughout the whole film, since the actress Zhao Tao ha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speaking the Taiyuan dialect and communicating with some Fenyang local persons daily. Zhao Tao comes from Taiyuan, the capital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which is located just beside Fenyang, and both of the Taiyuan and Fenyang dialects belong to the central area dialect of Shanxi Province. Nevertheless, for the Fenyang local audience there still remains some imitation trace in her accent, whereas for most Chinese audiences

from other places, her accent has already been a distinct symbol of Fenyang, a small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with strikingly conventional flavours of Shanxi, flourishing coal mine enterprises and distinctive natural landscape. As Hodson observes,

The audience accepts the illusion that ‘good’ accent is being performed and does not think about it further unless something (such as personal familiarity with the variety, or knowledge of the actor’s natural accent) triggers more careful attention (2014: 231).

Although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tandard dimension has not been conveyed by the English subtitles, the information loss can be totally compensated for by the settings throughout the film, such as local customs and practices, coal-min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in the film.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three components in the non-verbal visual channels, i.e. figure behaviour, long-take and setting, in this dialogue illustrates the full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in dialect subtitling without the need to further employ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s.

*On An Excerpt of Dialogue from Zhang Jinsheng*

Compared to Tao’s high frequency of dialect shifts between the Fenyang dialect and Mandarin, Zhang Jinsheng’s use of the Fenyang dialect is quite stable, which can be basically explained through the viewpoint that “women are, on average, the leaders in this change process” (Bergs 2012: 96). Or more specifically, women more easily adopt prestige forms and more frequently use innovative forms than men. From this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Labov develops three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linguistic behaviour of men and women: (1) For stable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s, women show a lower rate of stigmatized variants and a higher rate of prestige variants than men (2001: 266); (2) In linguistic change from above,<sup>[3]</sup> women adopt prestige forms at a higher rate than men (2001: 274); (3) In linguistic change from below,<sup>[4]</sup> women use higher frequencies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of innovative forms than men do (2001: 292). Based on her research into extra-linguistic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eties in the Portuguese system, Ramos Pinto (2017: 5) proposes that standard language is marked by high prestige, high sociocultural status and central region, while regional language is marked by low prestige and region. In China, when compared to some dialects, Mandarin or Putonghua “has legitimacy and power due to its prevalent use in all areas of administ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Chan 2018: 92). Moreover, “the prestige of a linguistic variety, or in other words,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the variety hinges on its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uch development” (Liang 2014: 12). Thu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Mandarin, with its fully developed spoken and written forms as well a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attached by the authority, is regarded as a standard language marked by high prestige. Whereas Fenyang dialect, spoken by people in a rural area in Central China, is seen as a regional language marked by low prestige. To some extent, Labov’s principle 2 can justify Tao’s frequent shifts from the Fenyang dialect to Mandarin and easy adoption of Mandarin as well as Zhang’s consistent use of the Fenyang dialect and refusal to use Mandarin or even English later. In short, Tao adopts a prestige form, Mandarin, at a higher rate than Zhang.

The excerpt in which Zhang Jinsheng and Dollar carry on a dialogue with the help of Google Translate is selected for analysis here, as it demonstrates a sharp language contrast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roughout the whole dialogue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Zhang uses the Fenyang dialect, and even the two English words are pronounced with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Fenyang dialect, while Dollar replies simply in English. O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Zhang’s usage of the Fenyang dialect reveals his depressive yearning for his hometown, Fenyang.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it suggests the language he speaks is still the same one as he spoke over ten years ago, even though he has been detached from the natural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such long time.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his consistent or even stubborn use of his own dialect and incompetency

in English after a ten-year long stay in the English-language environment indicate that he has difficulties in being, or is unwilling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

Dialogue	Subtitles
Zhang: 你能不能先給老子把中文學好 “老子”知道是甚了 “老子”就是father 我就是你的老子 我就是你張到樂的father (in the Fenyang dialect)	Zhang: Can't you learn your old man's Chinese? You understand “old man”? Old man means Father. I'm your old man. The father of Zhang Daole.
Dollar: True. You are my dad. But the Google Translate is your real son. (in English)	Dollar: 對 你是我的父親 但是穀歌翻譯才比較像是你親生兒子 (in Chinese)

**Table 3** Dialogues and Subtitles between Zhang Jinsheng and Dollar

Although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for the four dimensions is lost due to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the information compensation in the non-verbal visual channel has a compensation effect. Firstly, his attachment to his hometown and his past, originally expressed respectively on the 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can be instead represented by the actor's costume and makeup as well as setting shot by montage and long-take styles. Here Zhang Jinsheng is dressed like an old man living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he drinks Fen Liquor, a kind of spirit distilled in Fenyang, reads Chinese books, and eats peanuts, a popular Chinese snack to accompany liquor. All of these reveal his attachment to Fenyang. Secondly, the information lost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can be compensated for by the figure behaviour shot in the long-take style just before this dialogue scene, in which he does not respond to a foreigner's greeting on his way home. It seems that he does not become aware of this greeting until the foreigner has gone away, which at least suggests he is not good at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In terms of the standard dimension,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actually contains a defect of the actor's performance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regarding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Fenyang dialect. However, it is erased in the English subtitles. To conclude, the five components in the non-verbal visual channels, i.e. costume and makeup, setting, figure behaviour, montage and long-take, help to realize the full compensation without using certa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 **Exampl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s**

#### *On an Excerpt of Dialogue between Dollar and his Step-mother*

During his stay with his mother Tao, Dollar makes two video calls to his step-mother, mostly in Shanghainese, via iPad. As for the first time, Tao becomes aware of their dialogue in the kitchen with the sound effect of cutting and chopping when hearing two Mandarin sentences excitedly spoken by Dollar in the living-room (“Can we see penguins there?” and “Kangaroos!”). That is acceptable as people are always sensitive to their familiar languages. However, later still in the kitchen with the sound of cutting and chopping, Tao becomes intensely upset and indignant. That proves to be unacceptable to some extent, especially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regarding Tao’s Shanghainese level, because Dollar’s step-mother’s words are in Shanghainese. Firstly,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hanghainese well for people from North China without any living experience in Shanghai or learning experience in Shanghainese. Tao, a middle-aged woman constantly living in a small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should not be an exception. Secondly, the sound may be obscured by the iPad’s speaker, resulting from the processing of the digital device. Its volume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natural communication, which aggravates the listening difficulty especially for non-local persons. Nevertheless, in this scene, her strong emotional reaction implies that she has understood what Dollar’s step-mother talks about in the iPad, i.e. that the family will emigrate to Australia and that the couple has already made good preparation for that. Although the word “Australia” sounds quite clear in Shanghainese and almost the same as in Mandarin, normally only

one word should not be enough to cause Tao's anxiety and anger, because it might be easily treated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Therefore, this dialogue design in dialects turns out to be a fallacy due to the overestimation of Tao's ability to comprehend Shanghaiese. However, this implausible scene becomes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after subtitling into Standard English. As shown below, the subtitles in the film do not indicate the dialect usage in the dialogue. Some of the subtitles in this excerpt emerge as italicized words indicating the dialogue made via the iPad. For the film's English-speaking audience, the Shanghaiese obstacle in the verbal audio channel disappears in the verbal visual channel with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The viewers would not be confused by Tao's unreasonable understanding of Shanghaiese.

Dialogue	Subtitles
Dollar: 袋鼠啊 Kangaroo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Dollar: Kangaroo
Step-mother: 對 (in Shanghaiese)	Step-mother: Yes,
Step-mother: 旁邊一大片草地是自然保護區 (in Shanghaiese)	Step-mother: <i>the house is by a conservation area.</i>
Step-mother: 爸爸給你聯繫了當地最好的小學 (in Shanghaiese)	Step-mother: <i>Your Dad has spoken to the best local school.</i>
Step-mother: 這家小學的橄欖球隊是澳大利亞最棒的 (in Shanghaiese)	Step-mother: <i>It has the best soccer team</i>

**Table 4** Dialogues and Subtitles between Dollar and his Step-mother

Despite the flawed design of this excerpt, the use of dialect also conveys more meaning than its surface structure indicates. O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he Shanghaiese dialogue between Dollar and his step-mother reveals that Dollar has lived with his Shanghaiese step-mother for a long time in Shanghai.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 Shanghaiese used by both Dollar and her step-mother is “new Shanghaiese”, a form based on the Wu dialect. Meanwhile, old Shanghaiese, which emerged following the population settlement in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Shanghai,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and retains its usage in some rural areas of Shanghai. Thus,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it shows their well-off dwelling environment in downtown Shanghai.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as Shanghai is a metropolis in China and a famou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use of its dialect is generally a symbol of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or even elite class living standard especially compared to Fenyang. On the standard dimension, the new Shanghainese used by the two characters is standard, as the child playing Dollar is from Shanghai. On that dimens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ew Shanghainese they use reinforces their status quo of being i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Shanghai. Finally, in regard to the dimension of idiolect, no helpful information is discovered.

However, the textual functions on the aforesaid four dimensions have all been los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Shanghainese dialogues into Standard English subtitles, as the child actor's blan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heroine's inopportune reaction impede effective compensation accomplished in the non-verbal channels, and thus a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 needs applying to make up for that lack. It is found that the dialect usage has its textual functions to demonstrate Dollar and his step-mother's long-term closeness o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well-off living conditions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and higher status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on both social and standard dimensions.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that should be conveyed in the translated subtitles can be condensed into one point: after staying with her for quite a long time, Dollar has acquired from his step-mother a distinct speaking style that is dra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s biological mother, whose usage is generally seen as a symbol of relatively better-off living conditions and higher social status. Thus, one of the more concrete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summarized by Ramos Pinto—upgrading of the level of formality of the standard discourse—can be us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since it will firstly distinguish this excerpt from others through the subtitles in the verbal visual channel, just like using Shanghainese in the verbal audio

channel. That translation solution can highlight Dollar and his step-mother’s common usage of a distinctive speaking style, which implies their long-term stay together. In addition, its formality will impress the audience with an elegant and well-bred speaking style, which can point to pleasant living conditions and a privileged social status. For instance, some modification can be made to heighten the text’s formality as shown in the suggested subtitles below.

Original Subtitles	Suggested Subtitles
Your Dad and I went to the consulate today, the immigration paperwork is done. Dad called the lawyer in Melbourne, we’ve bought the house	Your father and I went to the consulate this morning, and our immigration paperwork is received. Father called the lawyer in Melbourne, and we’ve purchased the residential property.

**Table 5** Original Subtitles and Suggested Subtitles— Dollar’s Step-mother’s Line

*On an Excerpt of Dialogue between Tao and Zhang Jinsheng*

When Dollar makes his second video call to his step-mother, Tao cannot suppress her anger. So she grabs the iPad and talks into it herself. She firstly speaks Mandarin to Dollar’s step-mother, asking her to give the iPad to Zhang Jinsheng, and talks with Zhang in the Fenyang dialect. Tao speaks Mandarin to her son for smoother communication with him; and to the doctor in the hospital where her father’s body lies on this formal occasion. Tao’s Mandarin used to Dollar’s step-mother allows her to deliberately create a distance between them, especially in contrast to her Fenyang dialect used later to Zhang, as the usage of a dialect is often a symbol of intimacy or familiarity in China. “The persistence of dialects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friends in immediate social circles is what makes them irreplace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Chan 2018: 94). Moreover, the italicized words in this excerpt below also suggest the words spoken via the iPad as mentioned in the last section. But the two single words, both “Tao” and “What” uttered by Zhang via the iPad, are not in the italic style according to the subtitles appearing in the film.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Dialogue	Subtitles
Zhang: 咋了 (in the Fenyang dialect)	Zhang: What?
Tao: 你倆懂事不懂事 (in the Fenyang dialect)	Tao: Do you two have no sense at all?
Zhang: 我得給孩子訂機票 (in the Fenyang dialect)	Zhang: <i>I need to book the ticket for Dollar.</i>
Tao: 訂機票 訂甚機票 不用 我自己安排 (in the Fenyang dialect)	Tao: The flight ticket? No need, I'll book it myself.
Zhang: 能行 (in the Fenyang dialect)	Zhang: <i>Is that okay?</i>
Tao: 我會安安全全的把到樂送到你那 (in the Fenyang dialect)	Zhang: I'll get Daole back to you safe and sound.
Tao: 行不行 就這 (in the Fenyang dialect)	Tao: Okay? That's all.

**Table 6** Dialogues and Subtitles between Tao and his Zhang Jinsheng

On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 the common dialect used by Tao and Zhang is a signal of their common origin and life experience.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their usage of the same dialect weake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ocial statuses, even mirroring their past marriage bond.

In this excerpt, no intersemiotic redundancy is spotted between the verbal and non-verbal channels, but “a clear case of semiotic tension, or even of semiotic dissonance” (Pedersen 2015: 169) is identified to “unsettle their viewers, or to play with them” (Pedersen 2015: 169). Specifically, the sameness and closeness manifested in their usage of the Fenyang dialect is contradicted by Tao’s facial expression of annoyance, which invites the audience to ponder and imagine what has happened between them. This gives the film an additional semiotic tension by pulling the audience in disparate directions. However, this semiotic tension disappears in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as the dialectal information given on the geographical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s is missed. Hence, a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 is needed to represent that tension as well as compensate for the deficiency, such as the use of features common in oral discourse as shown in Table 7. Oral discourse can play the same part of the dialect used for realizing a different discourse from Tao’s talk to Dollar and his step-mother and reproducing her paradoxical closeness to Zhang.

Original Subtitles	Suggested Subtitles
Do you two have no sense at all?	Ain't you two got no sense at all?

**Table 7** Original Subtitles and Suggested Subtitles—Tao's Line

## Conclusion

In this article a dialect subtitl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proposed to analyze what exactly is lost in the levelling of dialect subtit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which the exploration of a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aim of compensating for the information loss in translation. Sometimes the intersemiotic redundancy emerging in the non-verbal channels can make up for the loss, which allows the film, as a multi-semiotic text, to attain its own information self-sufficiency even if the dialectal feature is missed in the levelling effect. However, sometimes a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 is suggested to be applied for the compensation, since the loss caused by the levelling effect cannot be offset by the information offered in the film's own non-verbal channels. In the scenes with actors' exuberant performances and lifelike costumes and makeup as well as elaborate setting arrangements, information self-sufficiency normally can be created. In other words, the loss in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can be fully compensated for by the rich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ose non-verbal channels.

However, in the scenes with limited performance space and setting, specific translation solutions generally should be employ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loss. The suggested translation solutions revolve around adjusting the discourse formality in translating the dialogue in dialects rather than selecting a specific dialec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for correspondence, in order to avoid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dialect stereotype in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at in the target culture. Nevertheless, discourse analysis is an alternative for such a translation problem. One can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information loss and then appropriately select the translation solution targeting such loss. Díaz-Cintas (2014: 212) advises subtitlers to rely on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interaction with the film's other signs to handle dialect translation issues, and on "an estimation of what viewers from the target culture might be expected to fill in themselves". Furthermore, the types of translation solutions applied are not necessarily only limited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discourse's formality as expounded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Instead, any translation solution capable of making up for the missing textual functions can be adopted and applied, such as the addition of written indications, using forms of address and honorifics, and even directly importing certain lexical features from the source text, etc., because compensating for the information loss is the skopos of dialect translation.

### Notes

- <sup>[1]</sup> Just as sentences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a verbal text, shots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film's multi-semiotic text. More specifically, long-take language is similar to the use of a long sentence, whereas montage language seems like the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short sentences.
- <sup>[2]</sup> *Xiao* (孝) means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It is a Chinese tradition that people wear black armbands with or without the character *xiao* for their deceased family members as a sign of mourning.
- <sup>[3]</sup> Such changes indicate linguistic changes in a speech community above the level of a speaker's conscious awareness. In this case, speakers are consciously aware of an ongoing change in a community and they can comment on this linguistic innovation (Meyerhoff 2011: 179).
- <sup>[4]</sup> Change from below indicates linguistic change in a speech community below the level of a speaker's conscious awareness. In this case, speakers are not consciously aware of a change in progress in a community (ibid).

### References

- Angus, Robert D. (2002). "Prestige and the Local Dialect: The Social Role of Shanghainese in Shanghai". *California Linguistic Notes* 27.2: 1-23.

- Bergs, Alexander (2012). "The Uniformitarian Principle and the Risk of Anachronisms in Language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Eds. Juan Manuel Hernández-Campoy and Juan Camilo Conde-Silvest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80-98.
- Chan, Tak-hung Leo (2018). "Dialect(ic)s of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TV Dra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51: 89-109.
- Delabastita, Dirk (1989). "Translation and Mass-communication: Film and TV Translation as Evidence of Cultural Dynamics". *Babel* 35.4: 193-218
- Díaz-Cintas, Jorge, and Aline Remael (2014).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ubtitling*.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Gambier, Yves (2012). "The Position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Carmen Millán and Francesca Bartrina.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45-59.
- Gottlieb, Henrik (2000). *Screen Translation: Six Studies in Subtitling, Dubbing and Voice-over*. Copenhagen: Engelsk Institut,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 Guo, Zhenzhi (2012). "Dialects and Local Media: The Cases of Kunming and Yunnan TV". In *Mapping Media in China: Region, Province, Locality*. Eds. Wanning Sun and Jenny Chio.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47-61.
- Hamaida, Lena (2007). "Subtitling Slang and Dialect". *Mutra 2007 – LSP Translation Scenario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11.
- 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2001).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1997). "Politeness in Screen Translating".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75: 78-96.
- Hodson, Jane (2014). *Dialect in Film and Literatur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Kwieceński, Piotr (2001). *Disturbing Strangeness: Foreignis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Asymmetry*. Torun: Wydawnictwo Edytor.
-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II: Soci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Liang, Sihua (2015). "The Poli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Language Attitudes and Identities in Multilingual China*. Ed. Sihua Liang. Cham: Springer, 11-33

## The Levelling Effect of Dialect Subtitling in a Multi-semiotic Text

- Lippi-Green, Rosina (1997). *English with an Accent: Language, Ideology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 Ma, Aliza (2016). Interview: Jia Zhang-ke. Retrieved 5 July 2017 at <https://www.filmcomment.com/blog/interview-jia-zhang-ke-mountains-may-depart/>
- Marleau, Lucien (1982). "Les sous-titres...un mal nécessaire". *Meta* 27.3: 271-285.
- Meyerhoff, Miriam (2011). *Introducing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Trinh, Minh-ha (1992). *Framer Framed*. New York: Routledge.
- Pedersen, Jan (2015). "On the Subtitling of Visualized Metaphors". *The Journal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23.1: 162-180.
- Pedersen, Jan (2007). *Scandinavian Subtit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ubtitling Norms in Sweden and Denmark with a Focus on Extralinguistic Cultural Referenc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 Pérez-González, Luis (2014). *Audiovistual Transl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Issues*.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Puah, Yann-Yann and Ting Su-Hie (2015). "Malaysian Chinese 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Foochow, Hokkien and Mandar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6.5: 451-467.
- Ramos Pinto, Sara (2017). "Film, Dialects and Subtitl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Non-standard Varieties in Subtitling". *The Translator* 24.1: 17-34.
- Ramos Pinto, Sara (2009). "How Important is the Way you Say it? A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ion of Linguistic Varieties". *Target* 21.2: 289-307.
- Rittmayer, Allison M. (2009). "Translation and Film: Slang, Dialects, Accents and Multiple Languages". *Comparative Humanities Review* 3.1: 1-12.
- Tien, Sunny (2015). "Pygmalion, Humor, and the Translation of Dialect". *Translation Quarterly* 75: 1-19.
- Wang, Shu-yan (2010).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s the Hubei Dialect: The Case of Hubei Migrants in Canton".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6.6: 81-86.
- Yang, Chunsheng (2014).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 Northeastern Mandarin and Putonghua (PTH) by Young Professionals",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5.2: 211-231.
- Wang, Zhimin 王志敏 (2007). *Dianying Yuyanxue 電影語言學 (Film Linguis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Zheng, Baoyuan 鄭寶璿 (2011). “Dianying Zimu de Yunei he Yuji Fanyi 電影字幕的語內和語際翻譯 (The Intralingual and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n Film Subtitles)”. 《中國翻譯》(*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4: 75-78.

### **About the Author**

Sun Xichen is a doctoral stud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 dialect subtitling, and translation instruction. Email: chara\_love@126.com.

# 回憶錄



## 香港翻譯學會的發展 (1991-2018)(一)

劉靖之

### 引言

香港翻譯學會在創會的最初30年裏，遵循1971年3月12日通知書裏所擬定的宗旨，保持學會的“純學術性團體”、配合社會發展需要，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學會組織主辦研討會、專業講座、翻譯比賽，頒發獎學金，出版《譯訊》、研討會論文集，頒授“榮譽會士”銜予傑出的翻譯教育家、學者、翻譯家，與中國大陸、臺灣、歐盟以及美國翻譯界進行交流。這些活動在香港1970、1980年代政治、社會的急速變化過程中，具有非凡、深刻的意義。事實上，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翻譯領域裏，香港翻譯學會在這30年裏的工作，對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翻譯界起了推動和示範作用。

我個人在學會擔任了四年的《譯訊》編輯(1976-1980)、六年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學會副會長(1980-1986)、以及前後共十三年執行委員會主席、學會會長(1986-2004)。在這些年裏，通過擔任學會的工作，對翻譯這個專業、這一學科以及翻譯所能起到的影響和作用，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在英國廣播公司的七年翻譯工作(1966-1973)和1980、1990年代所從事的兼職翻譯教學和研究工作，為我後來在嶺南大學擔任翻譯系的教學和文學及翻譯研究中心的研究、寫作、編輯奠下了基礎。

1991至2001年這十年裏，也就是說在香港翻譯學會成立後的第

三個十年裏，香港的語文教育和翻譯課程繼續經歷波動和變化。隨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中文的社會地位越來越見重要，應用也越見頻繁廣泛。為了提供更多大學學位，香港政府於1994年秋將香港理工學院、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浸會學院升格為大學，並把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改組為大學資助委員會。嶺南學院則於1998年升格為嶺南大學，再加上公開大學，到了20世紀末，香港從三所大學（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增加至八所大學。到21世紀初，樹仁學院和香港教育學院也先後成為大學。這九所公立大學和一所私立大學，除了香港科技大學外，均設有翻譯系或翻譯課程，對香港的語文生態和香港翻譯學會的活動難免有所影響。

由於中文的廣泛使用，香港社會對翻譯人員的需求減少了，尤其是翻譯人員最大的僱主香港政府和一些跨國公司，因為他們需要的是通曉運用中、英文和粵語、普通話／國語、英語的人才，而不僅僅是中譯英、英譯中的翻譯人員。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的是能夠靈活運用兩文三語的人才，所謂multi-lingualists（多種語文使用者），而不只是翻譯者。這種變化促使大學翻譯教育與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更注重雙文化、雙語種的比較研究。香港翻譯學會在會務上也作了一些調整，以配合新形勢的發展。

在1991至2006年這15年裏，也就是學會發展史裏的第三個階段，隨著香港回歸中國前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在會務和活動的安排上作了一些配合與調整，包括：一、與香港考試局合作設立公開翻譯專業考試（1991-1994）；二、繼續頒發“榮譽會士”銜予對翻譯有傑出貢獻的人士；三、與香港的大專院校、中國譯協（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上海科技翻譯協會、北京清華大學、國際譯聯（國際翻譯家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等國內外大學和翻譯組織聯

合主辦研討會；四、創辦出版學會學報《翻譯季刊》(1995)；五、從1992年開始設立頒發“香港翻譯學會翻譯獎學金”。

### 翻譯專業資格考試

隨著香港政府於1974年開始將中文定為法定語言之一、中英政府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和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有關香港問題聲明之後，香港各行各業對翻譯人才的需求日益急迫。為了應付滿足這些需求，香港各大學、專業院校紛紛設立和擴展翻譯學位、文憑、證書等課程。英國語言學會(Institute of Linguists)，現已升格為“英國特許語言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nguists)，在香港設有“中英文語言文憑”(MCIL)和“翻譯文憑”(Diploma of Translation)公開考試，及格者可獲頒文憑證書並獲香港政府認可，可申請香港政府的“中文主任”職位，為各部門負責翻譯和中文文書工作。因為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前，政府部門首長和高級官員多為英國人，需要將中文翻譯為英文，以瞭解民情；也需要將英文譯為中文，以利管治。

香港翻譯學會經常收到要求設立專業考試的建議，以評核香港翻譯和口譯人員的水準。學會於1989成立了工作小組，研究設立公開專業考試及其可行性。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大學教師、在職翻譯員和香港政府總傳譯主任。工作小組認為專業考試的內容與範圍應該考慮下列各項：

- 一、評審香港各級翻譯人員的水準。例如：低級程度證書的持有者可以出任低級移民局職員，高級文憑的持有者可以擔任較高難度的工作，如政策文件、年報等。
- 二、評審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翻譯人員的能力。換句話說，除了語文文化外，還要評審應考者的專業語文能力，如上述(一)裏所提到的。

- 三、專業考試與大學翻譯課程畢業生所取得的學術學位不同，一如法律學士需要取得專業資格後成為正式律師的情況。
- 四、為香港提供所需要的翻譯人員，包括沒有學歷的在職翻譯工作者。

工作小組與香港考試局，商談有關專業考試的具體安排，為香港翻譯學會設立這項專業考試。

學會是香港唯一的翻譯工作者的組織，因此有責任為從業員提供這種服務。但學會也考慮到這項專業考試所取得的資格在社會、專業上的認可性。就此，工作小組向香港學術評審局查詢有關專業考試的內容和範圍，評審局的答覆是：他們只評審課程 (Programme)，不評審考試大綱 (Syllabus)。學會充分認識到公開考試與大學學科的評審之間的分別。設立專業考試的目的是通過這項考試，讓有意申請香港翻譯學會會籍的人士，根據他們考試的成績，納入學會各級會員，借此為香港翻譯人員提供一些標準。

經過三年的考慮、討論，學會執行委員會批准了工作小組的“文憑及高級文憑”考試大綱，並於1991年10月開始實行。考試大綱於1992年4月和1994年4月修改了兩次。考試大綱的“引言”說：

- 一、文憑考試及格者可申請學會非正式會員 (Associate Member)
- 二、高級文憑考試及格者，可作為達到專業翻譯員的資格
- 三、非正式會員可報名參加高級文憑考試
- 四、高級文憑考試及格者可申請學會會員

### 負責專業考試的組織和安排的香港考試局

隨第一次考試於1991年12月21日舉行，共有127人報名，其中有2人獲部分試卷豁免、8人缺考、117人應試。成績如下：11人及格，獲



A和B級，佔應試人總數的9.2%，不太理想。

文憑考試舉辦了三年（1991、1992、1993），“高級文憑考試”也舉辦了三年（1992、1993、1994），前者有37人考獲文憑，後者有29人考獲“高級文憑”。詳細的數字請參考下列兩表：

#### 文憑考試

年	報考人數		及格人數		文憑獲取人數
	試卷一	試卷二	試卷一	試卷二	
1991	127	127	47	12	11
1992	51	64	19	28	22
1993	26	28	5	5	4
頒發文憑總計					37

#### 高級文憑考試

年	報考人數	及格人數	文憑獲取人數
1992	15	9	9
1993	233	14	14
1994	11	6	6
頒發高級文憑總計			29

上述的“文憑考試”，從1991年的127人減至1992年的51，再至1993年的26，減幅極為明顯，現在看來原因很簡單：1994年，香港理工學院、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和浸會學院同時升格為大學；1998年嶺南大學升格為大學；之後有樹仁大學以至最近的香港教育大學，再加上遠程教育的公開大學，這些大學均有翻譯系和翻譯課程。此外還有英國特許語言學會在香港的公開考試文憑，1980至1990年代初香港急需大量的翻譯人員，到了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對翻譯人員的需求已變為對“兩文三語”相互靈活運用的兩文三語人才的需求了。

“文憑考試”和“高級文憑考試”的大綱於1991年10月公佈，1992年4月及1994年4月兩次修改。“文憑考試”設“中譯英”和“英譯中”兩張試卷，各三小時；“高級文憑考試”為考生從“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科學與科技”、“商業及管理”的“中譯英”（三小時）和“英譯中”（三小時）選擇自己的專業，也是兩張試卷，測試考生的“中譯英”和“英譯中”的程度。考獲“文憑考試”資格者可申請成為香港翻譯學會的附屬會員，考獲“高級文憑考試”資格者，可申請為香港翻譯學會會員。

執委會於1998年就開始委任丁紹源、何偉傑、Cyril Thomas三位先生等成立工作小組，就翻譯專業公開考試的可行性進行諮詢、調查研究，並提交報告。一年後聽取工作小組報告之後，學會成立委員會，由我擔任主席，Cyril Thomas擔任義務秘書，委員包括丁紹源、賴恬昌、黃邦傑、羅志雄等資深學會執委，以及嶺南學院翻譯系系主任Harry Simon教授、浸會學院翻譯課程主任黎翠珍女士、中文大學翻譯系系主任金聖華博士、中文大學翻譯系主持機器翻譯課程的陳善偉博士等。這個委員會於1992年1月改組為“考試委員會”，負責考試、試題等事宜。

上述考試委員會成員，集中了香港專業院校翻譯專業、教學、研究的優秀專家學者，他們在繁重的工作之餘，無償地付出他們的精力和知識，為學會的公開考試作出貢獻。

### 《翻譯季刊》

我出版學術刊物是專業學會主要任務之一，缺乏學術刊物，“學會”就會變成“協會”或甚至“俱樂部”。《譯訊》用來報導會務和會員的活動，“論文集”和“研討會論文集”可以算作是學術刊物，但審稿不夠嚴，再加上研討會在發言的時間上有所限制，因此篇幅不利於複雜的學術討論。學會從1975年出版*The Art and Profession of Translation*研

討會論文集之後，在過去40餘年裏，出版了18種論文集，有些是百分之百研討會論文集，如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East and West - Selected Conference Papers* (1994)、《翻譯教學研討會論文集》(2000)；有的則部分是研討會論文，部分是特約論文，如《翻譯叢論》(1983、1986、1988)、《翻譯工作者手冊》(1991)、《翻譯新論集》(1991)；有的則是全部特約文稿，如《翻譯新焦點》(2003)。讀者很容易分辨學報的文章與研討會的文章，前者的要求肯定比研討會的要高。當然，凡事沒有絕對的，有的研討會的文章水準極好，有的學報文章十分普通，視個別學報而定。

回顧過去近50年的歷史，學會經歷了不同的執委會和主席/會長，對會務重點的理念不同，因此執委會所議決的活動在性質上和內容上也就不同了。那時香港的幾所大學幾乎都有翻譯系和翻譯課程，翻譯逐漸成為大學裏的重要科目，教師、學生的數量顯著增加，社會各行各業也急於需要這方面的人才，作為香港唯一的專業學會，似乎應該予以配合。經過多次討論，執委會於1994年4月21日決定組織出版學會學報《翻譯季刊》，並就學報的性質、份量、語言、稿例等有關事項作出決議：

性質：《翻譯季刊》應成為一份有正規審稿制度、符合“大學資助委員”會對 *Referred Publication* (審稿刊物) 要求的學術期刊。但為顧及會員的需要及興趣，除論文外，亦應刊登譯作及翻譯消息，與會員緊密溝通。

語言及稿例：論文以中、英文發表，譯作則以外譯中為佳。至於稿例，編輯委員會負責搜集、參閱有關刊物的稿例樣本，討論後決定。

編輯委員會：劉靖之(主席)、潘漢光(秘書)、潘漢光、餘丹(編輯)、委員：金聖華、歐劍龍、黎翠珍、羅志雄、黃國彬。

執委會還討論了學報的顧問名單，並由編輯委員會正式以書面邀請。

《翻譯季刊》創刊號於1995年3月出版，刊登了我的“發刊詞”和思果、林文月、金聖華和我的四篇文章以及何偉傑的書評，共77頁。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王健(Jan W. Walls)、余光中、何丙郁、林太乙、林文月、高克毅、楊憲益、鄭仰平、劉紹銘、賴恬昌、羅新璋。在“發刊詞”裏，我轉述了執委會有關出版這份學報的性質和功能，強調“一份嚴肅的、有審稿制度的學術刊物是極其重要的。作為一門學術科目，翻譯與其他專業學科一樣，應有自己的論壇。”我還向朗文出版亞洲有限公司董事長沈維賢先生致謝，感謝該公司負擔《翻譯季刊》的出版與印刷全部費用。學會還於1995年3月25日舉行的午餐例會上推介季刊。

第二期依時出版，但第三、四期因執行編輯的失誤而拖延至1997年初才出版，令學會和編輯委員會感到非常遺憾。另一次失誤是2000年，學報出版了五期！作為主編，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擔任這份學報主編的十年裏(1995-2005)，這兩次失誤令我深感內疚。第三件要檢討的事，是在我主編的35期裏，有18期是兩期合刊的。這一點接任我的主編陳德鴻教授就較有紀律。

香港翻譯學會是民間專業組織，缺乏經費，因此也就缺乏資源聘請人手，加上大學教師的教學、研究、行政工作日益繁重，對學會的會務，包括舉辦研討會、出版學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對教學和研究工作甚有影響。1970-1990年與21世紀情況大為不同，大學校長清一色都是科技出身的，對人文學科既不瞭解也不想瞭解，重科技輕人文之餘，還引入了美國大學都拋棄不用的管理手法和制度，令大學教師在教學、研究、參與學校行政和社會服務的四座大山重壓之下，難以有時間和精力來協助推進學會工作，因此《翻譯季刊》所遭遇的困難和挫折是預料之中的，但我們堅持了過來，現在踏入第三個十年。

《翻譯季刊》顧問從開始的幾位香港、臺灣和旅美的中國學者到

三年後加入的英國，美國和歐洲的Peter Newmark (紐馬克)、Eugene Nida (奈達)、Howard Goldblatt (葛浩文)、Göran Malmqvist (馬悅然)等以及新世紀參加的Mona Baker、Cay Dollerup、Wolfgang Lörcher、Gideon Toury、James St. André (沈安德)等。從顧問的增加，說明瞭學會及其學報在國際論壇逐漸獲得廣泛的支持，這些學者不僅擔任學報的顧問，還投稿給學報發表，令學報與歐美各國各大學進行全方位的交流。這固然是學會的幾次國際會議的召開的收穫，包括1991年與美國夏威夷大學聯合舉辦的研討會、2001年與國際譯聯召開的“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學報為這次論壇的論文出版了七期專號(第23-29期特刊，2002-2003)。

在我擔任主編的十年裏，執委潘漢光從第四期開始便參與編輯工作，這之後一直協助編輯。1996年9月我開始在嶺南學院翻譯系任教，兼任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陳德鴻開始負責學術訊息與書譯編輯。在我任教嶺南學院(1998年升格為大學)的五年裏(1996-2001)，陳德鴻與孫藝風兩位同事先後擔任過學報的執行編輯。第23至29期(2002-2003)“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特刊，由於需要從120篇論文選擇35篇，工作量相當重，因此邀請中文大學的陳善偉和童元方、嶺南大學的陳德鴻、理工大學的朱志瑜諸位教授擔任這七期的執行編輯。城市理工大學Robert Neather (倪若誠)與潘漢光兩位則負責書評編輯。第30至34期(2003-2004)，執行編輯則分別由朱志瑜、倪若誠、潘漢光擔任。

2005年是我知命之年，應該是時候從學會會長、學報主編位置上退下來。2004年6月，我從執委會主席退休；2005年3月出版的第35期《翻譯季刊》，我宣佈辭去主編職位，由嶺南大學翻譯系系主任、香港翻譯學會副會長陳德鴻博士(現已升為教授)繼任。在“創刊主編的

話”裏，我說：“《翻譯季刊》在過去十年裏經歷了不少挑戰和困難，包括缺乏內容充實的中、英文文章。造成這種缺稿的現象可能是由於學報的發行工作做得不好，以致優質稿件不多；另外一個問題是學會在經濟上無法負擔僱用專職人員從事審稿、編輯、校對等繁重任務。這兩個原因肯定影響了學報的素質，也無法依時出版發行。學會深信香港應該發展成為中英、英中翻譯和翻譯研究重鎮之一，學會對此充滿了信心。作為香港唯一的翻譯專業組織，學會有責任協助發展這項工作。”（原文為英文）我還通知讀者，說：“對一份學報，十年不算長，但對學報主編來講，十年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段。本會副會長、嶺南大學翻譯系系主任陳德鴻博士將從2005年的第35期開始。擔任學報的主編，我將以‘創刊主編’的身份留任為編輯部的成員之一。”在“創刊主編的話”裏，我還向關心支持學報的作者，同事致謝，對他們的辛勞表示衷心的感激。

我粗略地統計了從1995至2004年出版的第1至34期，共刊登了190篇論文、譯文和書評，其中香港學者撰寫了86篇、國內學者46篇、外國學者（以英國和美國為主）58篇、臺灣學者7篇。據主編陳德鴻的統計，從1995至2016年出版的第1期至80期共刊登了333篇論文、譯文和書評，其中香港學者撰寫了112篇、大陸學者129篇、外國學者92篇。這是有趣的統計，顯示了：一、在1995-2004年的十年裏，香港學者論文的數目幾乎是國內學者的一倍；二、1995-2004年的十年裏，外國學者的論文數目與2005至2016年的11年的比例是58:34；三、1995-2004年的第1至34期與2005至2016年的第35-80期，香港學者的論文數目的比例是86:26，而國內學者的論文數目在這兩個時段的比例是46:83。這些數字說明瞭兩種現象：國內學者的論文數目越來越多，香港學者的論文數目越來越少。外國學者的論文數目也越來越少。

我以為上述所顯示出來的現象很可能是由於香港學者對香港的學報的國際學術地位信心不夠，只願投稿給歐、美翻譯學報，認為美國、英國的翻譯學報比香港的享有更優越的國際地位。其實中譯英、英譯中的翻譯，除了文學著作、自然科學與技術翻譯外，香港的水準是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如法律、金融、貿易、經濟、商業等，因為長期以來香港的統治（官方）語文是英文、英語，需要譯成中文才能下達至百姓市民，因此凡生活上必需的各行各業均得從英文、英語譯成中文、粵語，於是成就了香港在翻譯領域裏的雙語環境。事實上，香港社會在中、英語文的使用上，較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是範圍和用途最廣泛、最頻繁的城市。我還深信香港的中英、英中翻譯，無論在學術上和實踐應用上，都達到國際水準。因此香港學者不要妄自菲薄，覺得外國的月亮比香港的圓、亮，不是的，中譯英、英譯中這個領域，香港要比外國的更圓、更亮。

2005年9月3日，在慶祝《翻譯季刊》創刊十週年的聚會上，我發表了講話，內容主要包括：一、學會邀請了三位傑出的翻譯家和翻譯學者來評論《翻譯季刊》第1至36期的內容、編輯等方面的素質。英國Aston大學副校長、德國文學教授Nigel Reeves評論說這份學報出色地完成了四項任務：(i)作為翻譯學術刊物，內容集中將中國文學與哲學翻譯為以英文為主的西方語文；(ii)作為討論翻譯的平臺，促進東亞、中國以至亞洲和太平洋區域之間的交流；(iii)通過論文的發表，評論、檢討香港大專院校的翻譯教學與研究；(iv)通過《翻譯季刊》的專號出版（如第23-29期的“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專號”）對翻譯研究做出了貢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講座教授黃國彬認為《翻譯季刊》有兩樣值得讚頌的貢獻：一是不為任何一派翻譯理論所牽制，不會由於在翻譯上的“昨是而今非”而感到尷尬，為翻譯學術界提供一個健康平臺；二是《翻譯季

刊》作為真正的“國際”性的學報，與其他海外學報有著相應的水準。香港公開大學文學及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翻譯系講座教授John Minford在他的報告裏說：《翻譯季刊》的最大的優點在於它的獨立性——它不附屬於任何一所大學，為此他向學報提出了四種不同形式的編輯方針。

當《翻譯季刊》進入第15年時，這份學報突然解決了困擾它多年的發行問題——從2009年第51期開始，《翻譯季刊》將加入數碼資料庫EBSCO Host，聞名國際的研究資料庫。通過EBSCO數碼資料庫，公共圖書館、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圖書館，讀者可以隨時查閱《翻譯季刊》刊登的論文、譯作和譯評，不僅較以往發行更有效率、更迅速，還能令這份學報成為全球翻譯研究者的刊物。從第51期EBSCO數碼網路之後，《翻譯季刊》編輯、發行進行順暢無阻。

## 其他刊物

### 《譯訊》

學會的《譯訊》則經常脫期——第33期出版之後（1992年6月）要到1994年12月才出版第34期，相隔了一年半！《翻譯季刊》作為學會的學報是非常重要的，但《譯訊》作為學會會員的通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關係到學會會務與會員之間的緊密聯繫，會員若不知道學會的活動，會員也就無從知道學會在做些什麼？1994、1995、1996三年出版了四期（34-37），然後兩年之後的1998年9月才出版第38期！這之後沒有任何改進——第39期（2000年7月），相隔兩年。2001至2006年間略有改進，這三年裏每年出版一至兩期，但2006年11月出版了第47期之後，要到2009年9月才出版第48期，前後近三年！2011年12月（第49期）、2013年12月（第50期）、2014年12月（第51期）、2016年11月（第52期），一再說明這一代年輕執委們不甚正視《譯訊》的重要性。



## 論文集

在過去40餘年裏，學會出版了18種翻譯論文集和與翻譯有關的刊物，有的是與其他機構共同出版的，如夏威夷大學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等。這18種論著中有九種是我著、編的，四種是與其他學者、翻譯者合作編纂的，如夏威夷大學Richard Seymour博士、北京外文出版社前局長林成蓀等。在1991至2018年間出版的10種刊物裏，《翻譯新焦點》(2003)、《香港翻譯學會簡史(1971-2006)》(2006)、《蛻變中的中國翻譯研究》(2011)、*Confluences: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Asian Contexts*(2011)等四種值得談談。

20世紀末，當時在嶺南大學翻譯系擔任系主任的黃國彬教授與我閒談時，告訴我說他希望我能繼續《翻譯論集》(1981，香港三聯)和《翻譯新論集》(1991，香港商務)兩本文集之後，編一本反映近十年來中國和香港的翻譯狀況，而我當時除了在翻譯系擔任教學工作，同時兼任嶺南大學文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這也就是說他負責翻譯系的翻譯教學，我則負責研究中心的翻譯研究和出版，因此他的建議我有責任予以考慮、接納。編纂論文集需要相當時日，除了策劃文集的內容，還要物色作者、與各作者討論論文的内容以便令收入的文章形成有機的組合。經過多次討論和協商，這本論集共收入文章10篇，大致上可分為三類：譚戴喜〈再論翻譯學〉、羅選民〈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孫藝風〈翻譯距離與視覺轉換〉、劉宓慶〈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新里程〉等4篇屬於中英、英中翻譯理論研究。二、朱純深〈句子翻譯內外觀：句子作為關鍵的功能翻譯單位元元之文本責任〉、黃國彬〈三言兩語辯中英〉兩篇從文本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的角度探討中英、英中以及其他語種的翻譯。三、朱志瑜〈清末民初時期關於翻譯名義的討論〉、嚴元浩〈香港雙語法例計劃〉、閔福德〈功夫翻譯、翻

譯功夫)三篇探討名義翻譯、法例翻譯和功夫翻譯的中英、英中轉換。我的〈21世紀的翻譯：香港的角色與作用〉一文，從歷史角度來總結經驗，權作論文集的概述。

1981年的《翻譯論集》總結了20世紀頭80年的文學和社會學著作的翻譯，1991年的《翻譯新論集》反映了1980年代翻譯研究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火紅年代，那麼這本《翻譯新焦點》所收入的10篇文章在於總結20世紀最後10年裏有關中英、英中翻譯研究的心得體會，從中取得經驗，進一步發展這方面的研究和實踐，以期逐漸建立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

## 學會簡史

《香港翻譯學會簡史1971-2006》是為慶祝學會成立35週年而編著出版的中、英文版學會歷史，內容包括引言、學會的成立、成立之初的十年1971-1981、學會初期發展階段1981-1991、持續成長的十五年1991-2006、結語等部份。附錄部份的資料相當豐富，包括榮休會長贊詞、榮譽會士贊詞及答詞、執委會名單1971-2008、榮譽會士/會士/終身會士/終身會員名單、會員資格、學會刊物、《翻譯季刊》十週年：三篇評審報告及主編的講稿、照片選輯(157張)。在“引言”裏，我把香港的兩種語文歷史劃分為五個階段：一、從1841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二、從1945年日本戰敗到1967年香港暴動；三、從1967年到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四、從1984年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五、1997年到2006年，回歸後20年。香港翻譯學會成立於1971年，屬於上述第三個階段，學會的35年歷史涵蓋了上述五個階段裏的三個，因此學會的發展與香港的變遷息息相關。

這本簡史之能夠成書出版，有賴於兩位執委編輯Robert Neather

（倪若誠）博士和黃紹顏女士，前者負責“史”的部分，後者專注附錄；以及執委陳德鴻教授、陳潔瑩博士、楊慧儀博士等人的參與。作為民間組織，沒有固定會所，文件、記錄、信件、刊物等資料，隨著人事變遷很容易失迭，好在學會大致上把重要的會務訊息都刊登在《譯訊》上，向會員報導。那些脫期的幾期都處於活動較少的時期，如1993年沒有《譯訊》出版，因為1991年底學會主辦了一連串慶祝學會成立20週年之後，正在休生養息，整個學會正處於執委換屆、人事調整時期。

### 《翻譯季刊》精選文集

在籌備慶祝學會成立40週年的活動過程中，學報主編陳德鴻建議從《翻譯季刊》第1至50期裏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編輯出版精選文集，中、英各一冊，作為學會成立40週年的獻禮。他覺得這50期的發行有欠理想，無法讓海外與中國大陸的讀者廣泛參閱，精選文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償這一缺陷。於是我們倆人從這50期的學報裏選出了15篇英文、16篇中文論文，於2001年底出版了 *Confluences: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Asian Contexts* 和《蛻變中的中國翻譯研究》。這並不意味只有這31篇中、英文論文值得選入這兩本精選文集，而是由於這些文章反映了亞洲，尤其是中國大陸在翻譯領域裏的主要趨勢，如近幾十年來“翻譯研究派”的翻譯理論和方法，導致中西翻譯文化的互動。英文文集分三個部分：“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和“Alternative Asian Contexts”。中文文集也有三個部分：“翻譯批評”、“散論翻譯”和“當代翻譯”。讀者若對第1至50期所刊登的論文目錄有興趣，請參閱<<http://hkts.org.hk>>。

## 稿約凡例

《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翻譯作品（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有關翻譯作品及版權問題，請譯者自行處理。

### 一、稿件格式

1. 請以電郵傳送來稿之電腦檔案。
2. 來稿請附200—300字英文論文摘要一則，並請注明：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3. 來稿均交學者審評，作者應盡量避免在正文、注釋、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份，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附上。
4.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16頁）為宜。

###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雙尖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 號用作一般引號；‘ ’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 三、子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1）作者／編者／譯者；（2）書名、文章題目；（3）出版地；（4）出版社；（5）卷期／出版年月；（6）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 六、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意。

## 七、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 八、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 九、來稿請寄：[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mailto: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

##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are required. Please attach one to th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your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where applicable.
3. In addition to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and typed single-spaced.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earlier issues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7.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Submission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referably be checked by a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mailto: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s.

## 《翻譯季刊》徵求訂戶啓事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的《翻譯季刊》是探討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大型國際性學術刊物，由陳德鴻教授及倪諾誠教授出任主編，學術顧問委員會由多名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組成。資深學者，如瑞典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美國學者奈達博士及英國翻譯家霍克思教授都曾為本刊撰稿。《翻譯季刊》發表中、英文稿件，論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編輯的半年刊《翻譯學摘要》。欲訂購的單位或個人，請聯絡：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地 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 話：+852 3943 9800

傳 真：+852 2603 7355

電 郵：cup-bus@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an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publication. Its Chief Editors are Professors Leo Tak-hung Chan and Robert Neather, and its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pecialist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field. The journal has previously included contributions from suc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the Swedish Nobel Prize committee judge Professor Göran Malmqvist,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Dr. Eugene A. Nida,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or Professor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nglish abstracts of its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edited by UMIST, UK.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should cont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dd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mailto: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http://www.chineseupress.com)

# Translation Quarterly 翻譯季刊

##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 Subscriptions are accepted for complete volumes only
- Rates are quoted for one complete volume, four issues per year
- Prepayment is required for all orders
- Orders may be made by check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r US dollars, or by Visa, MasterCard or American Express in Hong Kong dollars
- Orders are regarded as firm and payments are not refundable
- Rates are subject to alteration without notice

## ➤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x: +852 2603 7355**

**Order Form**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beginning with No.87 to 90(2018).

Subscription and order	Rates
1 year	<input type="checkbox"/> HK\$624 / US\$80
2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123 / US\$144
3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498 / US\$192
Back issues (No.1 to No.86)	<input type="checkbox"/> HK\$180 / US\$23 each (Please list issue no. _____, total _____ issues.)

Please circle your choice.

Prices are at discount rate, delivery charge by surface post included.

\* 10% discount.

\*\* 20% discount.

Attached is a check in HK\$ / US\$\* \_\_\_\_\_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le where appropriate)

Please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HK\$ \_\_\_\_\_. (Please convert at US\$1 = HK\$7.8)

I would like to pay my order(s) by:  AMEX  VISA  MASTER CARD

Card No. (including the 3-digit security code): \_\_\_\_\_

Expiry Date: \_\_\_\_\_

Cardholder's Name: \_\_\_\_\_

Cardholder's Signature: \_\_\_\_\_

Please send my journal to: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Telephone: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Ref: 20140402



中文大学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